

亲情之孝中儒基合作的广阔前景⁽¹⁾

[对谈者简介]

(张祥龙, 男, 1949年8月14日出生于香港九龙, 2022年6月去世。纽约州立布法罗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及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哲学教授;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外国哲学研究所”的学术委员, 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

摘要: 此文乃黄保罗与张祥龙教授关于亲情之孝中儒基合作的广阔前景之对谈, 包括个人经历与贺麟的引导对于走进北大哲学系之学术道路的影响, 现象学和道家研究, 回国之后讲授现象学的同时转向中国传统的研究, 亲情之孝中儒基合作的广阔前景, 儒学复兴与儒家文化建设特区, 及儒家教育和芬兰教育中的“学以成人”。

关键词: 亲情之孝、贺麟、现象学、儒基合作、儒家文化特区、学以成人



(1) 惊悉张祥龙教授于2022年6月去世, 《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杂志社曾将此对谈免费在网络发布以示纪念。该文正式发表于《国学与西学国际学刊》第21期, 2022年12月。

一、个人经历与贺麟的引导对于走进北大哲学系之学术道路的影响

黄保罗（简称“黄”）：今天是2018年4月29号，我们在湖南大学的岳麓书院集贤宾馆，所以很高兴和张教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对谈，张教授是国内著名的教授了，国学、西学都研究的，所以欢迎你张老师。

张祥龙（简称“张”）：很高兴能够跟你有这么一个对谈。

黄：对，我记得我最早和你接触是我写电子邮件冒昧的打搅你，是我写的儒家基督宗教与救赎，是我的英文的书，后来翻译成中文出版，现在是博锐出的，就是来登和波士顿出的，后来在中国出的，是让你来点评的，你后来给我写了一个，后来做我们书的一个附录出去了，那是2008年还是2009年。

张：对，你那个时候好像还是一个小伙子。

黄：你看10多年了，时间真快，后来我们在一起会议上见面，上一次可能谈的比较多的是哪一年我忘了，我们在澳门，就是武汉大学的赵林教授主持的。

张：对。

黄：也是儒家学者个基督教学者，我记得是有您、郭齐勇、林安梧、赵林，然后我和温伟耀、林鸿信、杨熙楠、王仲欣几位老师，好像后来赵林老师把那个出成书了，我还没有拿到那个书。

张：我也没有拿到。

黄：我知道出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的，叫《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与现代转型》。所以，后来我们在几个会议上又见面，今天就非常的高兴，我们在这里再聊。张老师，您可不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您是怎么走上学术的道路的，你在哪里出生，后来怎么，青少年上学，怎么最后上了大学？

张：我就是在香港九龙出生，所以叫龙。具体的地点是那儿的渡船街，后来母亲告诉我这个地址。文革后我第一次到香港开会，还去了渡船街，找到自己出生的那所房子，但是都变样了。当年是临海，所以叫渡船街，从九龙渡船到对面的港岛，我母亲说常过去买菜。但是我去的时候，由于填海造地，那个渡船街已经不靠海了。我为什么会生在那里？因为我父亲是与同学搞了一个建筑公司，在那边修路盖房子。他是北洋大学毕业的，学土木工程的。

黄：北洋大学是哪？

张：天津，当年是非常著名的大学。

黄：我想起北洋水师了。

张：那是洋务运动的一个产物，请的老师当时很多都是外国人。我父亲说这个学校是很难毕业的，恨不得有一半学生要中途被刷下来。

黄：有点像西方今天的大学，进去之后不一定，就看你成绩怎么样。

张：对，他毕业的时候已经有好几份工作在等着他去，所以是很受欢迎的。他选择了铁路上的工作，因为当时铁路被认为是铁饭碗。后来马上抗战了，日本人炸陇海路，他就在那管修路。他曾向我回忆，说几天几夜不睡觉，修桥修路。后来上面指示他们撤退，最后经西安撤到西南后方。抗战期间也是干这个。抗战快完的时候，一些同学都是老北洋的成立了一个建筑公司，我父亲在里面做工程师，当然因为是大家合资，也有股份。抗战后他们这个公司到香港和澳门发展，所以把我就生在香港。

黄：您是哪一年出生的？

张：1949年，我是家里老三，出生在那里。后来，香港有一段时间中地位不定，共产党过不过去，还不确定，这样就没有人投资，他们这个建筑公司生意就很惨淡。国内的一些老同学、老朋友又招他回来，当时国内也没有公私合营，所以还是跟以前一样干，他也就回来了。所以我也很早，实际上是

根本不懂事的时候就被带回国内，先在广州，后来又回到武汉住了几年，然后父亲又被中国纺织工业部录用为工程师，所以我们家就搬到了北京，也就是我差不多4、5岁的时候吧，从此就在北京生活。

黄：1953年、1954那样子。

张：对，我大致印象是在小学前在北京度过了两三年，后来除了到美国留学和到国外、外地教学，就都生活在北京，大致是这么一个生活经历。

黄：所以中小学、高中，你高中毕业是哪一年？

张：高中毕业都是文化革命中，我是1969年那个时候去参加工作的。

黄：你上山下乡了吗？

张：没有，因为我上的是一个电力学校，实际一开始是技术工人学校，后来改成中专。

黄：毕业了就在北京工作。

张：本来应该到三线建电厂的，后来正赶上当时美国和越南打仗，需要中国支援吉普车什么的，所以他们急需工人和技术人员，就被分配到这个工厂，也就是北京的内燃机总厂。

黄：你是在哪一年？

张：1969年进了北京内燃机总厂，它制造212吉普车的发动机，以及某种拖拉机的柴油发动机。

黄：工作大约几年？

张：工作了8年，然后赶上了第一次恢复高考，1977年，都年底了，一下子考上了北大哲学系。

黄：你是从一个工厂的工人，恢复高考是那个时代得大特点，怎么会想到哲学系，这几年的工厂生活，对你的人生又是一个什么影响，留下什么记忆。

张：这就是你一开头问的那个问题，要回答就得从这说起了。我真正的学术生活或所谓的学术生涯，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说来话长，文革开始时我还很天真，就参加进去，但是不满意于他们光是搞政治斗争或者后来搞武斗，于是我和我哥哥，还有一些他的同学，就想从思想上来理解文化大革命。我们觉得文革是很奇怪的一个运动，因为它是执政党自己搞自己，是毛自己整这个执政党，觉得一定有非常深刻的动机和效果，所以当时就由我牵头，办了一份报纸，其中的主打文章是我哥哥执笔写的，具体讲就是我的动意，由他执笔，最后我也有修改，于是就出了这样一份报纸，也可以算是一种红卫兵小报。当然，我们也不是那种什么出身“红五类”的红卫兵，我们这个红卫兵或群众组织是杂牌的，然后自己找到了印刷厂印了出来。当时报纸都可以自己印，然后就出版，出版的瞬间就被打成反动报纸，因为我们有一些新思考。

黄：这个应该是哪一年？

张：1967年初夏。

黄：你上班之前。

张：那当然了，那时候要在学校里，你才能干那种事，上班以后什么事也干不了，我上班以后基本都被半管制了，因为有问题，就因为这个事。

黄：算是有问题的青年。

张：对，所以这个报纸出版于1967年6月，我那个时候还差两个月才18岁，算17岁吧，所以当时有人安慰我，你还没有到18岁，还不会被枪毙，因为已经被批判得很厉害。

黄：会开什么会批斗你吗？

张：后来被多次批斗。最曝光的是被当时最红的上海《文汇报》，就是张春桥和姚文元掌握的报纸批判，它七月发表了一篇文章痛批我们报纸的头版文章，题目就是“评一种所谓的‘新思潮’”，其中“反动”之类的字样频繁出现。

黄：你这个报纸叫什么名字。

张：叫《四三战报》，你可能不懂什么是“四三”，当时北京中学成分成四三派、四四派，都是因为江青的两次讲话造成的，4月3号和4月4号各有一个讲话，就造成了这两派。

黄：你就叫四三，四三小报。

张：不，是《四三战报》，但这个是很次要的，关键是那篇主打文章叫《论新思潮》，这个新思潮就是我们想来标识出来，以便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我们阅读了当时看到的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主要是吸收马克思他们怎么看巴黎公社的观点；实际上还看了内部出版的，比如南斯拉夫有一位共产党人叫德热拉斯写的书叫《新阶级》，它就是批评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执政者又变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所以我们的基本思路就是说，毛搞文化大革命是因为要看到了这所谓的修正主义，或者是一个新的官僚阶级或阶层的出现，所以我们用了一个词叫“进行财产权利的再分配”，这就不用细说了。反正大致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说文革是为了实现马克思当年设想的打碎旧国家机器和清除所有资产阶级法权的理想社会，把权利和财产再次分配给人民。因为你刚开始掌权，统治者换了，但国家形式没变；实际上权利都掌握在执政的特权阶层手里，所以文革就提出来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我们不用这个词，我们就用“特权阶层”、“特权人物”，以便突出这次革命的特殊性，或它对于解放全人类的意义，但这就犯忌讳了。而且我们说以前的那个所谓阶级矛盾，跟地富反坏右的矛盾，已经变成次要矛盾了，而跟特权阶层的矛盾成了主要矛盾。这就被《文汇报》批成是反动，说你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想反对共产党的统治或无产阶级的专政。所以这个事情是深深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刺激我去做各种思考，而且这个事出了以后，就老是挨整，被划为另类，一直到文革结束。

黄：就是当工人的时候也挨整，挨整体现在什么，就是待遇吗？

张：当学生最后那几年，就被关过一次，所谓进牛棚，然后昼夜审讯让你交代。

黄：那你很年轻，18岁。

张：进牛棚的时候已经18岁了，他们主要不相信我们几个年轻人能写出来这个东西，他就说你后边有后台。

黄：然后你做工人是怎么样，有没有右派什么之类的，有没有什么帽子，就算有问题人士。

张：有帽子的，我的档案里头，离开学校的时候，他们搞最后审查，就是说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个材料是在我的档案里头。我到工厂以后，又被揪回学校过一次，他们忽然又想起我来，就是遇罗克被枪毙的几天之内，学校的军代表又派人来把我押解回去，就是说你这个问题没有交代清楚，到底谁是后台？后来又把我关了三个月，最后实在是找不到什么证据，就又放回来。所以我在工厂就是这样，进去的时候就带着这些所有的政治问题，然后又让人给揪回去了，所以工厂给我的工作就是全厂最差的，我的周围都是当时厂里的黑帮，所谓的厂长、书记或者工程师，都被打成黑色的了，或者是反革命，就是这样的。

黄：你接触的特殊人群团体。

张：而且工作就是铸工车间里的清砂，就是人家铸造出来的铸件，又热又都是粉尘，你要把外头的这些铸模的砂敲掉，然后把那个毛刺都要打掉，把里边的砂芯敲出来，非常辛苦、非常污染，很多师傅后来都是矽肺病。

黄：肺病，那时候什么口罩之类的，保健工作都够呛。

张：还好万幸，我们进去不久就发了可以防尘的口罩，所以我倒没有得矽肺。

黄：这样就干了8年。

张：8年。

黄：所以整个就是这8年与你那个小报引起的政治问题，是一直跟随你的。

张：对的。

黄：直到文革结束。

张：因为当时还是文化革命中，它过一会就有一次政治运动，每次政治运动来，都要把我们这些有问题的人拉出来批判或者是点名。

黄：你那时候的工作，也就是快20岁。

张：进工厂的时候20岁。

黄：20岁应该是幻想未来、浪漫青春、谈情说爱的阶段，那怎么样，找对象有困难吗？

张：肯定受影响，有这么重的包袱，但是毕竟我还有基本自由，我每天可以回家，我上下班，只是在工厂他有政治上的歧视。

黄：给你心里上，让你思考问题、探索问题，你心里上当时是什么感受，是恐惧、忧愁、担忧还是什么。

张：恐惧当然有，实际上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经历了好几次的巨大的恐惧，就是几次被打成反动学生，在这件事之前，就不必说了。到工厂以后，因为再没有什么大的新事实出现，所以到后来，恐惧已经都麻木了，就是觉得很绝望，就是前途完全无望。

黄：提干提不了。

张：根本想不到那个了，你想换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工作都不可能，因为每天都是极度疲劳的回去，又脏又累，像我又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我干那种粗力气活确实不如人家，没有人家那么麻利，那么的能干，所以那个班长，刚开始那个班长心眼我觉得也不太好，老欺负我们这种政治上不好的人，所以心情很不好，很忧郁、很沮丧。

黄：正值青春年华的时候。

张：对，就这样过了好几年。但是因为是在北京，所以我又认识不少朋友，因为办报纸认识的，都是些很好的中学的学生，很活跃的，包括后来著名的诗人北岛，都是我的好朋友。

黄：那时候就认识。

张：对呀，他刚开始写诗，最早的诗都是拿给我们看的。在这样的圈子里能借到很多书，思想也很活跃。

黄：一个团体、一个天地。

张：没有团体，就是大家交流书和思想、艺术这些，所以就这样的，一边思考，这边就受气，所以这个是最刺激思考的。

黄：你的生命体验迫使你的大脑去思考你的存在。

张：对的，所以看了很多文学书，特别喜欢俄罗斯的文学，托尔斯泰、陀斯托耶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

黄：对，我们现在还是在讲，我看到（19：55）《卡拉马卓夫兄弟》，我讲过这个研究，中央大法官。

张：但是感觉就是人生中最深的问题解决不了，还是解决不了。

黄：最深得问题是什么？

张：一个是觉得很压抑，这一辈子已经注定是贱民了。

黄：就这样，看到头了。

张：而且周围时刻都对你有歧视，有压力，家庭也是破散的。当时，父亲也是被弄到外地干校里头烧锅炉，哥哥姐姐也都在外边，就是我和母亲在这边。我被关的时候，我母亲想自杀，后来因为老同学劝慰，等到我回去，但是我回去的时候她头发也白了，眼睛后来也不好了。

黄：哭的。

张：她着急，所以在那段时间，还曾经看过《圣经》，找人借到过，读福音书也有一些感触，但是还是觉得解决不了人生的意义的问题。表面上是个人前途的问题，但是前途也牵扯到很根本的人生本身的意义。

黄：你为什么存在。

张：我受这个苦，是不是有能够超越它的人生的意义，一直有这种探索。后来很有幸，碰到了贺麟先生，也就是我的恩师。

黄：什么时候碰到他。

张：就是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前的2年还是3年。

黄：你怎么会碰到他。

张：是因为他的夫人是我母亲的大学同学，估计我小时候也见过他们，但是我是完全没有印象的。可是我姐姐是一个比较乐观，特别开朗和爱串门儿的这种人，她就跟贺师母、我们叫“黄孀孀”的，恢复了来往。贺先生文革中也被送到干校，那时候刚刚回来。

黄：这应该是1973年、1974年左右。

张：差不多1974年左右，后来我姐姐就跟我讲，她说你愿不愿意一个人？她说我老看你不爱说话，你愿不愿意一个老哲学家？我说那也好，那就谈谈，她就带我去了，那个就是我的一个转折。到他家里，贺先生的书房也刚刚打开，文革开始以后就被封了起来。

黄：没有抄家给他烧掉还不错。

张：是，房子也有一间被人家占了，他是本来一套房，几间屋子。我一见他面，就觉得心里特别有感触，一下子就觉得有光亮，或者宁静。

黄：或者智慧。

张：就是说有一种莫名的安慰，具体聊了什么，我后来也记不清了。可能是他问我，看过什么书，或者说对什么感兴趣，我就跟他大概说了一说。然后，这个我记得清楚，他就说：你既然愿意读书，就在我架子上挑一本书拿回去看。我就转过身来，我以前就从来没有见过那么高的书架子，几乎顶到头的那种，一整面墙都是书；我转过脸来，在书架上一排排地找，最后选中了一本斯宾诺莎的《伦理学》。

黄：还记得这本书。

张：当然记得，印象太深了！一看是贺先生翻译的，同时翻开前面几页，上面写的，你知道那个，他说神是怎么回事，自然是怎么回事，后边用几何学的形式来谈那些最根本的事情，是对神、自然、善恶和人生的很多根本问题的探讨，我觉得它可能与我关心的问题接上气。它跟神有关，但是它又讲自然和人生，我当时也不懂，就觉得里头好像有真东西。于是我就问：能不能借这本书？贺先生就很高兴，他事后跟我说：你当时一下子就挑了这本书，我心里就动了一动，因为他说实际上斯宾诺莎是他最喜欢的，虽然他以研究和翻译黑格尔著名，但是真正从情感和哲理上最喜欢的西方哲学家，还是斯宾诺莎。

黄：跟你有忘年之交、知音之感。

张：可能吧，但我当时还是何等地幼稚呵。所以我就借过这书来看，当然看不懂，但就是觉得新奇，看了一两个礼拜，然后再去找他。他就给我讲斯宾诺莎的生平，这个书的背景，和斯宾诺莎的基本思想。他不是那种学术化的讲法，而是从人生的角度来浸透进去。他讲斯宾诺莎受了很多苦，犹太人被人放逐，而他又是被他的周围的犹太社团放逐和排挤，但他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主张，至死不渝。贺先生讲得非常动情，因为文革很多年了，没有人跟他讲，他也不敢讲，动不动就会被人扣上宣传唯心主义的帽子；能够向我这个以全身心倾听的年轻人讲，他很愉快甚至畅快，我也很受感动，觉得离外边的世界

一下子遥远了。回去再看那书，每次都很有启发。就这样，一直硬着头皮看，然后由贺先生点拨，看了两三个月。

黄：就看那本书，那你这起点高。

张：就是凭着信心和内在的兴趣，一段段地读下来。

黄：直接就读经典了，你没有背那么多背景知识读那个书是很不容易的。

张：后来自己觉得真的看进去了，而且很享受。甚至我记得那个时候，因为家里远一些，我就在工厂附近还不通公交车的农村租了一间房，然后每次都是再回到那个农家小屋读它，最后读进去了，甚至直感到一种终极的真理，甚至是一种终极的感动和美感，有点宗教感情和意境。

黄：对，它确实有泛神论的思想。

张：甚至，我说实话，有时候就是有一种出神的感觉，所以特别感到一种喜悦和解脱，觉得发现了人生的根本意义，外在的遭遇不算什么。然后就写了一个东西，是我写的第一篇跟哲学有关的文章，实际上就是读后感，谈自然和神的关系，好像是这么一个题目。后来给贺先生看，他也十分高兴，后来听师母跟我讲，贺先生看了它的那天晚上都没有睡好觉，很激动。

黄：他那时候没有学生。

张：文革中不能招学生，关键是那个特别的情境。

黄：你比较厉害，直接进入大师了。

张：这就是一个机缘，所以我就觉得西方哲学特别美好，特别深刻，别的什么都没让我解决这个最终问题，可是那时我觉得真找到信仰了，而且这个信仰又是理性的，可以让我直接领会的。斯宾诺莎的哲学告诉你，你应该爱神，但是不要期待神爱你，因为神就是自然；但它又是神，它不只是物质自然，所以我要论证我体会到的这个，又有神、又有爱，又是自己成就自己的自然；我们应该爱它，它值得我们爱，值得我们为之捐弃小我，因为它这么丰富、伟大，深入万事万物的本性深处。那就是我的真正的哲学起点，也是人生的新起点。所以恢复高考，我刚开始根本就不想考，因为我觉得这样生活已经足矣，而且我背着这个政治问题是不可能考上的，你想想我档案里的材料。邓小平确实了不起，他要是同意像以往那样要求政审，我是肯定不能考的，邓小平老人家说不用政审，谁都可以考，为不知多少我这样的人打开了求学之门。

黄：我们这一代人真的要感谢邓小平。

张：中间有一些曲折就不讲了，最后居然是北大接收了我，就是1977级。

黄：从你知道可以高考，你复习，你是怎么预备法。

张：就是把那几门课本找来看，做一做题。但准备的时间很有限

黄：全是业余的还是学校。

张：业余，我都是业余的，还得上班。唯一的辅导就是我母亲，她是高中的数学老师，所以临时帮我，就让我背了几个公式，好像还用上了一两个，起码得到了二十来。我上的那个学校，高一点的数学也没有学，没来得及，我们刚上一年就文革了，我就是中专。

黄：你是初中毕业就上中专还是上了高中。

张：初中毕业就上中专。

黄：中专上了一年多就文革了。

张：上了一年不到。

黄：在上班之前你上了几年中专，三年？

张：说起来是四年，但一年没上完就都不上课，也就是参加文革运动了。1966年的6月开始全国学校的教学都停止了，所以我虽是1969年毕业，可那些年都是在文化革命的动荡中过的，又办报纸，后来就挨整，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黄：办报纸就是你在中专的时候。

张：是的。

黄：没有上足高中的课。我们再回到高考这条线，后来就这样下去考。

张：因为当时的心情就是那样，哲学是最美好的。

黄：你胆子有够大的，你敢报北大。

张：当然，我估计肯定是考不上，但是既然他让报，就按自己的理想报吧。我记得全都是报的哲学系，北大肯定是第一志愿，其他怎么报的我都忘了。其实当时那个情况，我说实话，现在回头想，北大如果不收我，别的学校也不会收我。虽然邓小平有那个不需政审的话，可是实际上，底下的掌握还是要讲政治的，因为我有一两个朋友，就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被拒收。所以我对北大一直是特别感恩。

黄：第一年没有录取？

张：对，那年就没有录取他们。我写了信过去，就谈我的学习经历和志趣，招生那个王老师被我说动了，就把我收了进去，北大这种宽容的传统，在我这个事上也能体现。我的文化革命的政治上的材料，是到我入大学后第二年还是第三年才被从档案上拿出的。邓小平主持政局以后取消阶级斗争，下了一个通知，让把文化革命中的这些不实材料通通从人们的档案中撤出来，所以我的档案中才没有这个东西了。所以这次高考是我生活命运的一次转折，但是真正从学术和人生志向的追求上讲，实际上是从上大学前就已经开始了。

黄：一个是你那种思索，经历促使你思索，再一个就是贺麟先生的这个接触，你这个经历还是比较独特的，独特中也有幸运在里头。

张：是，所以我是非常感恩。是不是祖上有德来保佑？虽然一直到上大学之前，实际上我的青春年代的很多时候，都是阴郁的，有很多的挫折和苦恼，尽管也一直在摸索和寻求。

黄：你上大学之后呢？

张：上大学之后就觉得人如在梦中，特别是头几个月，因为前面多少年一直是受到压抑的，上了大学成了当时社会的骄子。

黄：那时候不要讲北大，一般大学生都上天了。

张：对，特别看重你跳上的这个龙门。

黄：我记得，我的大哥也是考学，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有年龄差，那简直是光宗耀祖，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张：是，而且北大又那么美好，那校园就好，当时还不像现在，现在是修的很漂亮，但是当时更自然，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大学。

黄：一开始这样几个月晕晕乎乎的。

张：恍恍惚惚的，后来我就很投入了，也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

黄：那时候学风都比较好，大家都非常认真的读书，求学，特别珍惜时间。

张：是的。

黄：你上大学1977年，是多大了。

张：我上大学那年28岁。

黄：结婚了吗那个时候？

张：还没有，但是有女朋友了。

黄：可以简单讲两句，怎么可以找到女朋友，那种背景都没有人愿意嫁给你，是你的才气吸引了她？

张：可能也有一点关系。

黄：是你的同事还是别人介绍的。

张：相当于朋友介绍。情况是，我母亲是川大的，因为是抗战期间，她就在四川大学读数学。她有一个老同学，后来美国留学，回来进了南开大学，是院士，而且是中国比较著名的化学家，文革也挨整。我这边犯了事，办报纸那个事发了，我跑到他家去避难。我跟他们家的儿子，从小就认识，因为这经历就接触更多。他在天南大附中上学，后来天南大附中的不少同学就到内蒙古插队，其中就包括我的妻子。

黄：她到内蒙插队。

张：她插了很多年队，最近还写了一个回忆录。后来就等于是说，父母辈世交的儿子，他把他这个同学，当然低他两届的同学，介绍给了我。

黄：你妻子是你这个家的世交的儿子介绍的，是他的同学，这个女朋友就是你的太太。

张：对，现在的太太，当时她还内蒙，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在大学，我大学期间结的婚，一毕业就有了小孩。有了小孩以后，实际上我的思想又有一些转变，我之所以现在很认同儒家，就是因为自己有了家庭，尤其是有了小孩以后，对于亲情关系到底怎么回事，才有一个亲身体验。你看我一开始跟贺先生主要学的是西方哲学，先学的斯宾诺莎，后来跟他学的康德、黑格尔，还有一点谢林和费希特；到了大学我反而对中国哲学的，尤其道家特别感兴趣，因为我性格也是比较喜欢天然的东西，其实斯宾诺莎就有天然的一面，虽然他表面上很理性主义，大家叫他泛神论，他又讲自然。

黄：道家很吸引你。

张：对，我特别喜欢庄子，老庄，特别是庄子，所以我大学毕业的论文，就是写的庄子的人生观，是张岱年老师的指导。大学毕业时，因为特别迷庄子，就要去搞自然保护，因为就想到自然保护区做一个看林子的人。

黄：享受和自然的合一。

张：对对，又有大量时间，就是看林子嘛，又可以看书，又可以跟自然交往，就想去林业部的管自然保护的机构，因为我当时是第一届文革后大学生，人家说你不可能去当工人，你应该起码是一个干部。后来跟人家林业部联系，回答说我们不要你这种专业的，我们要学生物的、林业的或者地理的。后来没有办法，我们班主任帮我左联系右联系，最终联系了北京市的环保局搞自然保护的，自然保护区，所以我还真搞过一段自然保护。

黄：现在是时髦词了，那是哪一年毕业。

张：1982年春天毕业。

黄：就进入北京市环保局。

张：对，自然保护区。为了建北京的几个自然保护区，就去考察，组织北大的或者师大的搞地理的、搞植物的，我就跟他们一起去，向他们学。我觉得这些经历对于我也很有影响。我特别喜欢进山里，最后经过他们的指点，加上自学相关书籍，就会认一些植物，还会辨认自然的植物带和地理地貌的结合，还自学了一些地质学、生态学之类的东西。

黄：冰川什么的。

张：非常喜欢那个东西，所以就等于是说是一种现代的道家体验，有人称之为博物学经验。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虚度，尽管与我后来的研究表面上不相关。其实在那儿也就呆了两年，然后觉得，那个工作主要还是坐办公室，就不愿意，就想办法调到了北京市社科院哲学所，参加了他们的研究项目，一个分析哲学的项目，所以我还是搞过一段分析哲学的。为了学卡尔纳普的逻辑语法，我又回北大去听外哲所的课，这样到了1986年我就考了托福，去美国留学了。这之前我没有想过留学，促使我走那条路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以前那个阴影又回来了。有一个机缘，又回到那个中专学校，对立面的人，也就是掌权的那些人，他们就知道了我上了北大，感到很震惊。于是就马上给社科院递了一份伪造的黑材料，当

然也有真的成分，就是我以前办过“反动报纸”，但是因为那个在文革后已经不算大事了，他们就伪造我参加武斗打人之类的事情，其实我是最不会打人的，文革中看到打人就觉得恶心。

黄：诬告你是文革造反分子。

张：是的，因为当时上面要抓三种人。

黄：那是哪一年的事情，抓三种人，就是清理文革的人，你是文革受害者，却把你当成文革的另一种人。

张：就是去打人的人。那是毕业之后，就是1984年、1985年期间。后来哲学所、就是北京市社科院哲学所的领导找我谈话，说人家来揭发你有这个问题。我说这个绝对是诬告。他就让我写了材料，说明情况。

黄：觉得安全感又没有了。

张：这个黑影它跟在后边，总想把你吞没。幸亏那个领导是经过文革的，大略知道他们这一套路数，所以最后没拿这个太当回事，起码没有整我，但是对于我很有些刺激。

黄：对你心理刺激大。

张：所以我想一定得出去留学，这里太不安全了。事后看来，那个诬告也是坏事变好事，本来我根本不想出国，还是要时常到山里去，因为在社科院也不坐班。但后来没有办法，就申请美国留学了。

二、现象学和道家研究

黄：你出国是1986年，比较早。

张：1986年秋天。

黄：一开始去读硕士？你是美国哪个大学？

张：先读硕士。我去的是俄亥俄州的一个叫Toledo（托莱多）的大学。西班牙有一个古城叫Toledo，我估计这个城与西班牙人曾有过什么关系，后来当然还是美国的。

黄：去就是学哲学。

张：当然。我还特别喜欢托莱多这个城，那个系也是很美好的一个系，不大，但是我学到了不少真东西。而且老师对我们很好，我很感恩。其实，对于美国当时给我的很珍贵的学习机会，以及体验一个新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机会，我一直到现在还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尽管这些年来美国领馆和海关总是无端地找我麻烦。

黄：那是自费留学还是公费？

张：完全自费，就是靠托莱多大学给我提供的助教金和免学费，没拿国家一分钱。我算是读得快的，两年就得了硕士，三年半得了博士。在托莱多大学学了美国哲学、英国哲学、印度哲学，分析哲学也选过一门课，但是我当时抱的目的就是要学现象学，因为在国内读了熊伟先生的几篇翻译海德格尔的文章，挺受触动的。没有真看懂，但是觉得那个风格吸引我，因为熊先生用了一些道家的词、庄子的词，“无何有之乡”之类的，来翻译海德格尔的话。

黄：把你道家的情怀唤醒。

张：对，就觉得西方还有这种哲学家！所以就很想学这个。去了以后，在读硕士的时候，上了一门关于萨特的课，是伽什锐（G. Guthrie）教授开的，全课就是读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给我启发特别大。

黄：萨特！我记得80年代我都上本科，萨特、尼采那都是红的不得了，我们搞不懂的人都要买一本萨特在手里。

张：是的，我们主要就是读那本书。那个老师也极好，视野开阔，理解生动，没有多少学究气，后来我们多年保持联系。他前些年去世，我很难过，给他夫人写了吊唁信。就从那门课开始，我就正式开始学习现象学，当然还有很多别的也学到了，比如印度哲学，后来指导我的硕士论文的，就是印度裔的学者，他当然已经入了美国籍。我的硕士论文写的就是，大概东方这边是道家、禅宗，西方这边就是海德格尔，集中于他们关于语言的思想。后来论文完成得很顺利，而且导师和参评的老师们的评价也比较高。

黄：有点像比较哲学的样子。

张：我的硕士、博士论文都是东西方哲学比较的。这篇硕士论文后来还被翻译成德文出版了，在德国。

黄：那你就是1989年毕业的。

张：1988年毕业的，我1986年10月去的，实际上是不到两年就毕业了。

黄：你的英语在哪里学的。

张：就是大学期间。

黄：就是北大的时候学。

张：初中学了一点，但是早忘光了。

黄：就相当于上了大学基本上从零开始。

张：对，从零开始。

黄：为了出国再考托福。

张：是的，当时国内可以考托福，没有GRE，所以到了那里，人家让我再补考GRE，因为他们需要一个GRE成绩。所以一开始，压力极大的，我这个英语你想想，阅读可以，但是口语和听力不行，我去的时候都37岁了。

黄：你是妻子、孩子在中国。

张：对，头一年是我只身前往，但是过了一年，把他们就接过去了，所以我的小孩的英语后来很不错，就是因为他的英语是5岁时，跟那个院子里头各国留学生以及美国人家的孩子们玩出来的，所以他的英语也是第一反应。这样，读完硕士就去申请读博，有多所大学接受了我，有的还给了双份奖学金，但我选中了SUNY at Buffalo，就是纽约州立的布法罗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系统中最大的那所，在水牛城，因为他有中西哲学比较的指导老师，最后博士论文做的就是海德格尔与道家。

黄：所以你这个研究现象学，研究海德格尔的这个经历、地位就从这里就开始了。

张：就现象学的学习来说，关键是那边有一个老师，是叫Kah Kyung Cho，实际上是一个韩国人，他的中文名字叫曹街京，留学德国的海德堡大学，Gadamer(伽达默尔)又是他老师又是他朋友。

黄：然后到美国去工作，韩国人在德国跟Gadamer学，然后到美国教书，成了你的老师。

张：对，他是我的指导委员会的三个教授之一，但是我的主导师还不是他，是另外一个。他的办公室，那个曹街京老师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他和海德格尔照的照片。他在快毕业的时候，去到海德格尔“隐居”的托特瑙山上，去拜访这位大师时，两个人在海德格尔的山间小屋里照的。所以从那个曹老师那里，我学到了比较地道的现象学。他是很严肃的、特别能抠文本的一个学者，一开始学的是胡塞尔的现象学，主要内容就是细读所谓的《大观念》，即《纯粹现象学通论》，是《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的第一卷。上了这门课并仔细阅读了胡塞尔的一些著作后，我才明白，你不懂胡塞尔，不但进不到现象学中，而且对于海德格尔，你也不可能深入领会的，就像你不懂康德，你对黑格尔是不可能深入理解的。所以从那里，才算受到了比较像样子的现象学训练。在他那里主要上了两门现象学的课，胡塞尔一门，海德格尔一门，是不是还有别的我有点忘了。当然还有很多别的课，包括维特根斯坦、古希腊哲学和逻辑学的一些课。

黄：博士论文。

张：博士论文就是做的那个“海德格尔与道家”。

黄：哪一年完成的呢？

张：我比较快，3年半就得到了博士。

黄：1991年。

张：对，1991年底答辩，1992年2月得到的学位。

黄：我们来交接的好，我1991年离开中国到芬兰去，一直到现在，你1991年毕业。

张：对，已经答辩通过了，就相当于已经完事了，只是手续是1992年2月办的。

黄：毕业之后。

张：参加完夏季一起办的毕业和授学位典礼，就回中国了。

黄：从1986到1992年。

三、回国之后讲授现象学的同时转向中国传统的研究

张：我1986年去，一共差不多将近6年。因为我实际上得到学位以后，在那里又呆了半年，收集一些材料，并做讲座和开会，但是一心就是想回来，因为我对中国文化由衷喜爱，也觉得只有回国，主要用中文写作和教学，才能发挥我的潜力。但是八九事件出了以后，我以为回不去了，心里是特别地难过。

黄：八九对你的，你当时在美国，从外面旁观，听到这个的心情。

张：心情很悲哀。实际上我也参加了学生的一些抗议活动。可是正好在我得到学位那年的春天，就有了邓小平南巡，一下子气氛就变了。前两年江泽民还发表了几篇挺左的东西，邓小平南巡说要开放，他就变了，不怎么左了。于是，我7月份就回去了，携家带口。

黄：回来的时候在哪工作。

张：就是北大。本来北京社科院是给我留了房子，特别希望我回去，我也想回去。后来我北大的老同学王伟，他在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任教，来信力邀我进外哲所。他之所以知道我要回国，是因为在我回去之前，我们那个系主任，就是我在布法罗大学的那个系主任，受邀到外哲所访问，从他那里就知道我快毕业了，于是王伟兄就代表外哲所邀请我加盟。

黄：那个时候在国外拿哲学博士的不多。

张：的确不多，尤其六四以后，回去的人就更少。我真是觉得，因为我是搞中西比较的，中文是第一语言，所以中国更适合我，因为我希望自己的学术事业以中文的土壤为基地，与国际的交流要以这里为源头。

黄：你这里你是怎么克服那种内心的恐惧感的，你看你在自己那几年，后来又六四，然后就是1992年之后，你做出这个决定，我在国外生活也知道，有很多因素要考虑，综合起来内心的恐惧感是怎么能够战胜，或者对国家有一个乐观的信仰，或者是对自己是怎样。

张：一个因素是，我在国外专心向学，被现象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交汇可能的新思想境界强烈吸引，所以虽然也关注国内外的政治进程，但实际参加的政治活动很少。就是八九以后，其实它跟我们个人好像表面上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但是当时实在是太难过了，国外的报道也是有一定偏向的，我们也就受到影响，所以出自真情实意，参加了一些抗议和捐款的行动，其实涉入并不深，我也没有担任任何机构的职务，只是有一些基于良心的举动，所以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大。第二就是当时国内的动向，我觉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确是真心的，它不会因为这么点事就找我的麻烦；而我那个历史上的事，确实是一件过去的事情。

黄：我指的是这个意思，你在社科院又有人来诬告你，你产生过去的那种恐惧。

张：但是毕竟，你想想，那个领导的处理方式还是给我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的。他很客观，也很严肃找我谈，说这个你不可轻视。我当时气得简直就是拍桌子，斥之为诬陷，质问是谁在告发或捏造。他说这个不能告诉你，你也不能激动。那个领导（所里的书记）是北大调来的，一位姓金的老师，就是我们哲学系过去的。他说：你要很客观地写出应答材料，说明你到底是有没有这个事。如果的确没有，谁能作证，或你自己能拿出什么证据，等等，其实是点拨我。所以我觉得毕竟是文革以后，中国人经过文革，确实有了一定的抵抗力，或政治免疫力，上上下下都是这样。

黄：但是我就想知道这种内心恐惧，有很多人，因为像莫言，他在谈他的人生，他就是饿，一直就找东西吃，有的人就是逃跑，有的人一直就是恐惧，恐惧这种东西太可怕了，我的意思是说，你当时想要出国留学与这个事件有关，唤醒你的恐惧，你现在怎么能够回来，你这个恐惧感是怎么战胜的，是不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

张：一个是我真喜欢这个文化，不愿意离开这个语言和文化环境。我在国外，因为搞的是比较哲学，找工作时可能相对还要容易一些；我并不是全是西方这一面，跟你们完全比西方哲学的功力。我那个导师也说，我要愿意找工作，他可以给我推荐某某大学，但是我确实觉得，我在国外顶多就是谋个职位和工作，谈不上思想本身的事业。由于语言的障碍，虽然我也可以交流哲学上的学术信息，但是跟人家那些第一语言是英语的学者们没法比。第二个考虑就是，母亲、亲戚、朋友很多都在国内。

黄：综合考虑。

张：当时父亲刚去世，但是也很想回来给父亲上坟。尤其是我直觉里感到，邓小平的改革让我们能进大学，他后来又有南巡讲话，表明他并不甘心这么下去。他跟毛泽东是不一样的，有世界眼光，有民族感情，绝不会再搞全面的阶级斗争，所以还是有一定信心的。

黄：邓小平在这两件事情上对你起了重大影响。

张：所以我要说实话。

黄：如果没有南巡讲话你不一定回来。

张：可能。从个人角度，对他确实是感恩的，毫无疑问。但他改变了无数像我这样的人的命运，以及中华民族的命运。要是没有他，多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就终身处于那么一个状态，国家也会在内斗中衰败，家庭和民族精神就会陷于意识形态的深渊。

黄：我们再回顾一下你博士论文，海德格尔和道家，你这篇文章你觉得你主要的亮点在这个文章里面是什么。

张：基本观点就是说海德格尔与道家之间有某种内在思想关联，尽管也有不可忽视的区别。从事实角度看，海德格尔对于道家有强烈的兴趣，我也尽量去发觉这方面的事实。

黄：他文本中的一些根据。

张：我当时也发掘了一些事实，后来在研究中找到的越来越多，更证实了这个联系。从1930年开始，我们就已有相关证据了。他公开引用老子、庄子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一直到60年代，他还在著作中几次引用老庄，或以极度尊崇的态度谈论“道”，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主要就是他的思想对于我们理解老庄，和理解中国的古代哲学，有很重要的启发。当然不止于他，包括胡塞尔、舍勒和法国现象学，现象学这一条或一组新的思路，对于理解中国古代哲学比以前传统的通过柏拉图、黑格尔、亚里士多德、康德等等，要更合适得多，这是又一个方面。还有，就是说海德格尔跟道家也确有学理上的内在的相互呼应，所以他才会喜欢。海德格尔是一个很挑剔的人，尤其对于跟他熟悉的西方语言不一样的哲学，更是充满了戒心，因为你知道他说语言是存在之屋，那他实际上是有自己居所的限制的。

黄：完全怕误导他，比较谨慎。

张：大家是分属不同的屋子嘛，隔着那么远，所以他在这方面很谨慎。但是他对道家确实是从1930年开始就表现出兴趣，我估计他是20年代就读了老庄的译本，要不然1930年也不能够公开显示出

来。所以这样两者之间有什么学理上的沟通根据，也是我那个论文要探讨的。总之，除了事实方面的佐证，以及他和道家的学理上的可沟通的地方，还有一个他启发我们怎么理解道家的可能。以前的人对道家的理解哪里有问题，通过海德格爾的视野就可能可以看得更清楚，比如说，以前的人都认为“道不可道”，道跟语言是没有根本关系的，而通过海德格爾相关思路的启发，我看到实际上道家里面那个“言”有多重含义，像庄子讲的有小言和大言，也就是对象化的和非对象化的不同的言说方式，所以庄子是有意识的开发和运用所谓的大言或道言，比如他说的“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这种非对象化的、情境化的言，以及“卮言、重言、寓言”去说这个道，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海德格爾启发了我来看道家，能看出当时学界很少人看到的東西，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点，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

黄：1992年回到北大，回答北大之后北大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这是第三段。

张：当然又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最大的担心就是怕对不起儿子，因为孩子10岁了。

黄：他们有一点挑战了。

张：他5岁去的，10岁回来，他在那边发展的非常好。

黄：我们知道，像我们在国外生活，最大的困难就是孩子，有很多人不住了，就是因为孩子，你那个年龄还可以，有的13岁到16岁，那就很难了。

张：我太能理解了。我回来为这个事也跟妻子反复的讨论，她刚开始是很犹豫的，所以我本来想回社科院，因为那里连课也不用教，当时我没觉得进北大更重要，我说实话，虽然那是我母校，但是社科院它自在。

黄：时间充裕，做研究，你又是这种性格，喜欢思考，有独立空间。

张：喜欢跑到自然去晃悠悠，但是我妻子她是对的，她说孩子的教育，进北大能进北大附小，就这一条把我管住了。所以后来那边的老同学又热情叫我去，我就最后选了北大，孩子马上进了北大附小。一开始非常困难，就是住宿也是。我们在美国，虽然是一个外国的穷学生，但是也确实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帮助。我在的是纽约州，民主党当政，按规定我也可以去申请那所谓低收入人的租房。因为我有孩子，很快就排到了，让我去住。那房子上下三层，底下是车库，下面是厨房、餐厅、客厅，再上面是卧室、洗澡间。

黄：在国内就是别墅。

张：在当时国内的情况下，这种条件不多。回国进北大还算幸运，我们没有住筒子楼，分了一套独单房，实际上就是一间房，一个小厅，就放一张床，孩子在里边睡，我和妻子住在那一间房里。但是好在它全须全尾，有厨房，有自己的厕所。而厕所是当时回国对孩子最大的挑战。他在北大附小上学，一天憋着不去那个厕所，当时附小那个厕所让他受不了。每次我听到楼梯上咚咚的脚步声跑上来，忙给他开门，他就一下子冲进厕所，失魂落魄，就是这样子。但是逐渐也就习惯了，关键是你怎么想，要是老挑毛病就总是不满意。最怕的就是孩子跟不上，最后一塌糊涂，心理压抑。后来还好，碰到的那个老师不错，而且孩子也比较争气，加上我妻子也是尽全力辅导他，这样他一年就赶上去了，以后他就一直站在前头，而他英语的优势又是现成的。中文补上了，其他的优势就出来了，所以他在国内学习特别顺利。

黄：这是最大的挑战，这个与你后来对亲情等等这方面的研究，真实的生活的重要部分。

张：对，因为他要是发展特别糟糕，确实对我会形成很大的障碍。还好，只要家里头是一个健全的家庭，你对这个孩子全力支持，又加上他的老师是一个比较通情达理的，所以我是非常感恩这些老师，小学老师、初中老师、高中老师，后来他上的都是北京相当好的中学。中学毕业以后，他就去美国读书，他自己选择的，我希望他还是在国内读本科，他当时那个成绩在中国上北大、清华毫无问题。

黄：现在呢？他在哪边生活。

张：他在美国生活，已经在美国工作了。

黄：你也就一个孩子吗？

张：就一个，不让有多的啦。我是最不喜欢这个独生子女政策的。总之，到北大以后，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好办了。

黄：你的教学和研究呢？

张：我一开始课很少，因为是在外哲所，所以有大量时间来写作和研究，我就把我的博士论文改写了，最后变成了重写，不是翻译，基本上就是重写，但英文论文是一个前面的引导，这样在四年内完成了我的第一本书，就是《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这本书应该说还是很成功的。

黄：就是哪一年？

张：1996年出版的。当时收到很多读者来信，他们反响很热烈，学界反应也很好。

黄：我是1996年拿博士，在赫尔辛基大学拿博士。

张：祝贺你。所以后来沿着这个方向做，现象学、比较哲学是研究重点。

黄：你就主要负责，北大其他现象学的多吗？

张：也不少，现在衰落了，当时还是很好，我们哲学系（与外哲所合并后）当时有4、5位老师是搞现象学的。

黄：所以出这本书，教学会开始教一些现象学。

张：对，现象学导论之类的课，都要教。当然，因为我一开始就是中西比较式的，所以不止于它。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北大教学还是以西方哲学为主，西哲史、现代西方哲学、现象学等等，但是后来呢，就有重心的转移。我在北大一共教学20年。

黄：现象学这一块，第二块是什么东西呢？

张：就是中国的这边。

黄：这是什么时候开始，从现象学出来搞中国的。

张：因为一开始就是有联系的。

黄：因为你是虽然在外哲所，但是你是搞比较的，所以中哲一直你也弄着。

张：也跨一些。但是刚回国那些年，北大是崇洋媚外的风气特别重，我要教西方这边，学生就受欢迎；我要是教中国的，或者是讲一些中国文化怎么好，他们都不爱听。这几年有时候还见一些老学生，现在都已经是某些学术单位的负责人了，还跟我说，张老师啊，我们很后悔，当时您说的那些话，我们没有往耳朵里听，就是中国这边有多少独特的价值，现在再看您的书，觉得受益特别大，悔不该当时不听你的。情况大概是这样。

黄：你这个转好的，在大家都是比较崇洋媚外的時候，你自己有很强的西学背景，然后留学再回来，你怎么会看到中学的东西。

张：我是一直就喜欢。

黄：你一直就喜欢，像你刚才说的要搞自然保护。

张：道家。

黄：你觉得这不是你的一种先知式的一种预见，而是你真正的喜欢。

张：就是喜欢，主要就是喜欢。我喜爱西方哲学，也是发自内心，它给了我人生的新生命，比如斯宾诺莎的哲学，或者是康德、黑格尔。但是贺先生本人就是中西比较式的，他虽然当时跟我讲的主要是西方的，但是在我跟他的交谈中，他经常要用中国的宋明理学乃至道家来帮助我理解这些西方的理论，而且他的书里头也有不少这种研究，将中西哲理加以比较。比如说比较朱子讲的太极和黑格尔讲的绝对，又比如对比宋儒的直觉法与西方哲学家们运用的直觉法，那些文章给我印象颇深，所以这个是深植在我的学术血液中的，就是中西比较。而我对中国那边的喜爱，如我已说到的，从道家开始，后来又转向儒家。

黄：儒家这个大约什么时候装便，你已经教现象学教了一段时间，你后来教道家了吗？没有。

张：没有专门教过道家，但是就是做比较的时候，涉及到道家。

黄：你比较的时候就是道家儒家都可以谈到。

张：对，都可以谈到。

黄：还是一开始谈道家多一些。

张：基本上是差不多，因为我回国以后，儒家意识的已经开始明显了，从《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就能看出来。我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只涉及道家，回来重写时就加了儒家的部分，起码有一两章。我的儒家转向，主要是因为有了自己的家庭，我刚才跟您讲的，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当时就是觉得，如果这个孩子需要我去捐一个什么器官什么的，我相信自己绝对毫无疑问地能做出来，可是要为别人捐器官，你就得想一想或者要选择了。所以我深感到，这个亲子关系不同寻常。为什么到了孩子这里，我开始就不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了；或者说，人就能够从根本上感到他人存在的价值，甚至对于我来讲，他的生命价值绝不比我的少，甚至更多。所以我觉得，儒家的根子扎在亲子关系里，起码在这一点上它是有根本的生命力的。所以从这时候开始，已经从感情上有些转向儒家，但是从学理上讲，还有一个深入反思和能力扩展的问题。当时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已经开始读儒家的东西了。我认识了一个台湾去的同学，后来成了好朋友，他在台大学哲学的时候，还拜过当地的一个儒者叫毓敏的老先生为师，实际上是清代王室的后裔，姓爱新觉罗氏的，他在那办了一个儒家的私塾，就是自己招徒弟。我这个同学是他的徒弟，磕头或者是行大礼拜过师的。他就跟我介绍老先生怎么教他们，从礼仪到经典。他还向我介绍港台新儒家，就是他在台大时读到的牟宗三、唐君毅他们的书。而我在美国的时候，那个学校也可以借到这种中文书，当然都是台湾出的、香港出的，就看了钱穆的《国史大纲》，以及牟宗三先生的几本书，对于我还是蛮有一些影响的，那就是一个开端。当然回国以后，主要是自己读，对儒家越来越有感觉，和道家几乎就不相上下了，后来更大大超出。

黄：就开始写文章，后来写书了吗？这方面的书。

张：出了不少本，这些年已经明显向儒家倾斜。有一本书叫《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很早就出了，2000年左右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已经再版两次，后来又出了一个扩充版。我在北大教学的后期，连着开了几门儒家哲学的课，形成了三本书。

黄：哪三本？简单说一下。

张：一本是《孔子的现象学九讲》，另一本是《先秦儒家哲学九讲：从〈春秋〉到荀子》，还有一本叫《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从董仲舒到陆象山》，所以实际上是从先秦一直讲到宋代的儒学。我这学期在中山大学，讲的是儒家乃至东方的心学，以明代王阳明心学为主，将来如果有幸能够形成一本书，就相当于那个系列的第四本了。自己觉得对于儒家哲学还是有些独特的体会，以前就写了些，像《从现象学到孔夫子》里头，收了我若干通过现象学的视野来理解儒家的文章，有一些新的体会，跟国内的中国哲学史界对儒家的研究是很不一样的。

黄：从现象学这个方法论来看的，通过工具。

张：我实际上对现象学有一些改造，因为受中国古代哲理的影响，也会反作用回去，所以我虽然对胡塞尔、舍勒、海德格尔和重要的法国现象学家们是充满了崇敬，但是也感到他们的学说有些不足的地方，还不够。

黄：你觉得不足在什么地方。

张：主要是他们的思路还不透彻，达不到生命体验的最原初的发生层，所以限制了他们对最亲近的人类关系的思考。比如，他们的哲理力度还是达不到儒家的血脉，也就是这个亲情的时间化构造的层次，所以理解不了亲亲、孝道的哲理。后来的列维纳斯倒是开始谈到了，在他的那本《整体与无限》中。我很晚才读到它的英文版，这两年我的一个学生把它翻译成中文。在他那本书里头，家庭甚至亲子

也出现了，但是跟儒家理解的是非常不一样的，对于我也还是很有启发。可是他们所有谈的这些都还不足以使我能够充分领会儒家的东西，却很有启发，尤其现象学的时间观，从胡塞尔开始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时间之流，到海德格尔的所谓的时间性，《存在与时间》中的那个时间性，是一种生存化的时间。还有就是列维纳斯的所谓的他者、面容，而且他认为真正的时间是源自家庭，这是他《整体与无限》最后的地方，有一句话就说到这个。

黄：时间源自家庭，这个源自家庭是什么。

张：是指家庭结构构成了代际时间，就是说前辈、后辈和你现在这一辈，就是过去、未来和现在，所以这个给我很深的启发。

四、亲情之孝中儒基合作的广阔前景

黄：我记得那时候在澳门给你聊过孝，你是什么时候关注孝这个问题，作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写东西，这个是什么时候，在北大时候吗？

张：当然在北大，第一篇差不多都是十几年前了。

黄：2000几年那个样子。

张：对。

黄：而且你是把海德格尔的时间观和这个东西联系在一起。

张：是，我是通过时间观，但是他的时间观已经不够了。

黄：他的观点不够，你再加上你张式的对时间的解释，来解剖孝这个研究对象，来分析它。

张：所以这是一条路，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情感和感受的现象学分析也有分量，所以舍勒的情感现象学对我启发也很大。

黄：今天我们讨论还提到了。

张：对，对，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列维纳斯的思路也有启发。

黄：对，他者、时间、情，然后和你亲子关系，然后孝等等这些东西，那几个好像是一种辅助，或者是工具一样，让你再来反思家的这种东西，这是我估计以前研究儒家的人，是很少从你这个角度来研究的，这个现象或者对象的，那我呆会再来关于他者等等，再回来聊这个问题，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什么时候有这种想要搞一个儒家特区一样的这种概念。

张：这个也有十几年了。

黄：在北大。

张：对。

黄：也是零几年。

张：也是零零年之后不久，很早了。

黄：你的基本想法是.....

张：基本想法就是对于儒家命运的关心和提出建设性的建议。我不像很多人对儒家很乐观，有不少研究儒家的人，或者是喜欢儒家的人，比如像蒋庆这样的老朋友，他们都比较乐观，但是我一直是如履薄冰，看到的更多是艰难。从我的研究视野，看到全球化的趋势，看到整个世界高科技发展趋势和人类生存方式的趋向，都是不利于家庭的。而我理解儒家，有一个特点，和港台主要讲心性的新儒家也好，和大陆的更多地谈制度的新儒家也好，很不同，就是我特别重视孝道、家庭，我觉得儒家的根子就在这里，而且只在这里，儒家将来的复兴或者复活的命脉也在这里，必须抓这个，不然就不是真实的儒家。

黄：我来给你做一点点回应，这也是我的观察，儒家，我们常说的修齐治平，修身，你今天我问了一个问题，真正一个人修慎独修，能成为君子，成为圣人，达到至善，这个到底有多难，我要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人是很绝望的，我感觉这是第一条。治国，治国我们今天讲天命的概念，王朝是以德配天，然后天才把这个使命交给这个人，但是中国的历史上常常是改朝换代是以革命的形式进行的，那就说明它没有做好，这个命才被人家革掉了，而且用暴力革的。那平天下，我也在考虑一个问题，我们中国特色、中学传统，还有劝解华普世，都搞一段普世都不能谈的，我说孔老夫子说的，我们如果真好的话，德高望重，万邦来朝，人家就来，其实这个平天下，我觉得这三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挑战，在现在的语境中。

张：当然。

黄：但是齐家，这一点我倒认为，这可能是中国能对世界做重大贡献的地方，我自己在欧洲生活，现在最重要的问题，你在美国呆过，我想你最起码也关注这个，在美国、欧洲的同性恋问题，他把他理解为天生的基本的人权，不仅仅说同性恋可以合法性，享有婚姻，享有财产，享有继承、交税的、扣税的，这不是主要问题，不是法律这方面的，现在是要把婚姻的概念改变了，定义改变了，在芬兰也是去年法院有效的，我的印象是2002年好像，芬兰国会就通过同性恋可以合法登记了，就可以享受法律的、社会的待遇了，但是去年3月1号，正式把婚姻的定义改掉了，结婚不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而是两个人的，所以婚姻是两个人的，而不是一男一女的。

张：跟性别没关了。

黄：这是法律，现在再来干什么，在芬兰最最火热的话题现在，全社会大力的攻击教会，逼着教会要给同性恋者举行婚礼，要让神职人员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给两个男人或者两个女人举行婚礼，在媒体上政治正确的问题，你就要想搞什么竞选，无论是政治竞选还是教会内部的，请问你对同性恋怎么看，你只要一句话，不同意，你就不要选了。

张：一票否决了。

黄：政治正确就是这样。再一个晚婚、离婚、单亲、未婚生育、婚外生子一系列这些东西，搞到最后就是说，大家就是没有那种责任感的同时，就没有那种我们叫 commitment (委身/负责)，他为什么不愿意结婚，我自由，我结了婚之后我天天不自由了，还有说要养孩子，我自己都还养活不好我自己，还养什么孩子，这个是在欧洲影响很厉害的，这一点我认为这是现代性，就是以理性为主，最后发展成理性主义这套东西对家庭带来的问题，这一点与教会是相反的，所以现在在欧洲这个极端的自由主义，我们称之为叫fundamentalist liberalism,是教会的敌人一样的，这么厉害。那么恰恰中国的传统像你讲的，我们晓得老舍的四世同堂或者父慈子孝，这样的状况，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对于世界能做重大贡献的，当然现在中国也遇到极大的挑战，年轻人离婚等我刚才讲那些现象也都出现了，这一点倒是我觉得真的，这不是从基督教来，是从西方来的，但是不是从基督教来，而是西方的世俗化的社会，以理性主义，以无限的个人主义导致的结果，所以这样的话，所以为此我也花了很多的精力做这件事情，我翻译路德，我今年就是在上海三联会出一个芬兰学派的，研究路德的，是三本小书的合集，叫做芬兰学派之父的著作集，另外我翻译了7本路德的著作，今天准备在山东出版，其中有一本《路德论婚姻》，我到时候送给你，请你好好的来指教指教，我这里就在谈路德整个论婚姻这一套东西，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做一点回应，我自己感觉，婚姻家庭破碎太厉害了，它破碎之后就导致的结果就是人的那种不健全的发展和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再然后就是没有责任感，没有责任感面对一种所谓虚无主义，就是孤独，我没有谁关心，谁对我也无所谓，像你这种，因为你做了父亲之后的那种亲情，那样一种精彩的人生体验，现在就是我自己就行了。

张：我之所以能挺过文化革命，也跟家里亲情有关。父母亲在关键时候对于我们的支持，让我们在最深处还有温暖和希望。他们虽然当时都不敢从政治上表现什么，但是我在外面挨了整，回家生重

病，他们对我充满关爱。还有父亲让我读苏轼的《留侯论》，那里面就是说一个人要能忍，留侯就是张良，在艰难中受教，以至于“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就是说这个做大事业的人，就得有超常的忍耐力，所以当时对我启发很大，很得支持和教益。

黄：所以你这也是幸运的，家里面没有搞的那种，家人也互相揭发。

张：那个就是绝对家庭悲剧了。

黄：我昨天晚上跟郭齐勇先生在聊这个问题，他就说他的人生有这个很惨痛的经历，就是在文革中，也是遇到亲情的，就被文革洗脑，搞的那种扭曲。

张：那种故事有时候都不忍听下去，家人相互揭发是最凄惨的事。你说的这个对，我也觉得西方的这些问题是全球化的问题，将来只要是这种西方带来的全球化，向各国扩展，这个家庭衰败的风潮，到处都会出现。

黄：这一点回到这个，我为什么下了大工夫来翻译路德、研究路德，因为路德是新教的奠基人，没有他就没有 Protestant（新教），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个就是说路德有人他罪魁祸首就是他把婚姻本来是一个 Holy Sacrament（圣礼），是一个圣礼，天主教的七个圣礼，路德把它搞掉了，把婚礼不算成圣礼了，所以婚姻的世俗化，因为婚姻是神圣化的，所以婚姻的世俗化路德是罪魁祸首，这是有的，就是所谓的现代性，我也在研究，我基本上也是倾向于路德是真正所谓现代性的鼻祖，我和复旦的（孙向晨）教授，我们俩有过很一样的对谈，他很认可我这个观点。

张：我直觉里也是这样，路德比较鼓励个人。

黄：他就是要把教会的一统天下打破，让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积极面对上帝，上帝就是永恒，够是绝对，就是真理，这个之后呢？所以在这这里我就讲到，我专门在探讨这个问题，就是路德论理性，因为路德讲理性的时候他说了两句非常重要的话，第一句话理性是魔鬼撒旦最大的荡妇，跟着它就是灭亡，第二句话，理性是上帝赐给人的最伟大的礼物之一，你如果信了上帝，你有了这个礼物，理性就是礼物，如果你不信上帝，理性就给你带向灭亡，你像我们讲的是契蒙运动之后来的，其实不是契蒙运动，最后是理性主义，它不是讲，注重理性是对的，使用理性也是对的，但是搞这个理性主义，科学也是对的，搞什么科学主义，你想这不就是像魔鬼撒旦一样，所以这一点路德的确，他是对这个有重大影响，但是后来我花了这么大精力收集很多来翻译，搞了30多万字，他的基本观点路德认为婚姻是神圣的，婚姻是上帝设立的，它是一个神圣的制度（Holy Institution），不是圣礼，圣礼他特别的定义指与人旧恩相关的，灵魂进天堂相关的，婚姻不是直接与灵魂进天堂相关，但是它是神圣的，因为婚姻的目的，他认为婚姻的目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要生养中多，上帝造了人之后，你看给亚当、夏娃的一个任务之一，管理被造的生物及自然，我们生态神学里面讲管理，（management），然后叫生养众多，就是我们中国叫做的传宗接代。第二个他要婚姻是解决性问题的一粒解药，性是人要面对的问题，如果婚姻的话，就是让性合法化，他是同消极的意义上解释，根本没有谈爱情的问题，如果我自己的总结，在路德看来爱情不是婚姻的前提和条件，爱情是婚姻的结果，结了婚之后，你就得有爱情了，然后就是家庭，诸有此类这些东西，所以我花了很大精力在研究这个东西，我也发了几篇文章，讲到这个，因为这个都是在西方的语境中要谈婚姻就必须谈路德，必须要谈基督教，这是在它的语境中。所以在我们中国这种状况，然后面对又是全球化的，我觉得你谈这个孝，一个我们讲说婚姻这个概念，我给你做一点吻合，我是认为这是抓住时代的重要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孝的问题，你是讲到比如他者，讲到时间，讲到情，然后讲到孝的问题，这个情一方面可能是我们自然的一种本能的情感的表达，对于上代和下一代的这样一种时间列的一种关系，然后对孝，我记得那次在澳门跟你聊过，要讲孝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孝敬我们的服务，出去本能的生物的东西之外，可能主要原因是我们生命的来源在那里，我们要追我们的生命是同父母而来，从祖父母而来，所以要孝敬父母、尊重敬拜祖先，这可能是孝地但是这种孝的话，人的话，父母也不是完美的人，他有时候给我们很多很荒唐的东西，你只是比较幸运，你的家庭

充满温情，但是有很多家庭是惨不忍睹乐观，就是亲人反目、父子为仇也是有的，这里就讲到孝，因为在中国文化当中我们讲孝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用这样（01：32：26）的方法等等这些方法来谈，我的感觉，我们一讲孝有很多人有很多害怕和担忧，一讲孝就是二十四孝，那不是，要让你什么割肉给父母吃，愚孝、愚忠，又怕孝再成为一个由头，成为一个让你愚忠的这样一种，不讲原则、不讲真理的，就是所谓的腐败的、落后的这种可怕的，我觉得这是很多人担心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也在想，我也是试图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基督教上帝给（01：32：58）十条戒命，前面几条，我是独一的神，你不可以拜其他的人，不要拜偶像，要做安息日，这个都是讲人和神的关系，是将人和天的关系的，是形而上和绝对的关系的，底下几条，讲的是人和人的关系，再讲就是所谓的人伦，再讲人伦的时候，第一条就是孝敬父母，而且要孝敬父母要在（01：33：35）带有奖赏性的，也就是我们中国说的如果这个人孝敬父母缺德，老天都要惩罚他，所以在基督教的理论中，我看来人伦的第一就是孝敬父母，这和中国应该是相似的，假如我们中国不说人、神关系的话，只讲人伦的话，从伦理学的角度也是一样的。但是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五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个是双向的，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慈子孝，这个是对的，双向的，但是后来就是三纲，虽然有人有不同的解释，但是还是把它解释成单向的，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这有一点，就像无论我尽不尽一个做父亲的责任，儿子永远得要被迫一样，就像这个，有人认为这在儒家的发展上，这是一个落后和倒退的一个坏的现象，所以在基督教里面，路德的解释什么叫不可孝，要孝敬父母，他是怎么来解释的，他是很有意思的，他孝敬父母的第一条，无论我们的父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论他的经济、他的道德，哪怕我们的父母是道德不完美的人，哪怕是一个所谓的坏人，我们都要孝敬父母，原因没有其他，就是因为我们的肉体生命从他们而来，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要认识到我们的父母，按基督教的说法也是有罪的，或者用儒家的说法是不完美的人，所以我对他不一定言听计从，因为他说的很多观点有可能是错误的，那我怎么办呢？那么按照路德解释所谓的孝敬父母是什么，他给我出什么主意说什么话的时候，我知道那是错的，我一定做了决定，不接受的，但是我还要对他表示出爱心，爱心是什么？因为他可能就是由于父子关系、亲情关系他才提出这种建议，由于他是一个有限者，他尽最大能力，只能搞这一套东西给我们，这个东西是坏的、不好的，但是他可能是出于爱心的，所以我为此要向父母献上感恩。所以底下就是说，我可以不接受，按照我们俗话说的，你不要给爸爸妈妈说你这个老糊涂，你说这什么笨主意，不要有这种话说，要说谢谢你爸爸，你这么关心我，我来认真考虑，这个认真考虑最后，就是不要让你愚从，不一定要遵从他，我觉得这是路德在解释孝敬父母那一条，他跟我们讲的五常，有点符合五常的原则，就是避免那种单向的三纲的东西，这是讲这个状况。

另一点，就是孝敬父母，这个父母是我们肉体生命来源不错，但是他不是完美的父母，那么我们怎么找到这个父母的权威性，就像孝，孝这一套理论，如果我们上升到哲学最高来抽象的话，不是伦理问题，而是哲学的形而上的问题的话，就是他的权威从哪里来，这里就是在中国的天主教的一些儒家，像韩林他们，（01：36：55）他们都提过，利玛窦提过，讲上帝就是大父母，中国的儒家也说过天地是大父母，好像这个类似的概念。所以在基督教上帝是天父，所以他这样来谈，我觉得能够有一个推到最后，推到上帝观，或者我们先秦里边的，《尚书》里边的，《诗经》里边的上帝观，然后他可能会找到所谓绝对的他者的这个根源，这是我的一点想法。

张：对，我觉得你的这个思路，可以作为将来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途径。适应中国文化，又言之成理，从基督教的角度看也言之成理，而且比较适合中国人的心理。但是它跟儒家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尽管儒家可以接受你讲的那些，就是路德讲的那些也不错，因为儒家也讲“几谏”，就是你劝谏父母的时候，一定不能够正面顶撞，但是你不但可以，而且是应该劝谏父母犯错的地方，这是《孝经》和《礼记》里，孔子反复强调的。只知道服从父母的，根本不是真的孝子，一定是要有自己的主见，有

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这方面与你说的是基本一致的。差异在于所谓“大父母”的问题。大父母可以讲，比如说天地是大父母，但是儒家特别强调根源，不管是我们的爱的根源也好，价值的根源也好，甚至你想到的那个权威的根源也好，它不可能来自大父母，而是大父母之源。我们之所以知道那是大父母，是因为我们自己体验到了真实的父母，尽管真实的父母不完美，但是就像路德讲的，因为他/她是我的父母，他/她与我就有特殊关联。

黄：再不好也是父母。

张：这里头就有一种发生的完美性，很简单。我们用这个话语，就是因为他/她是你的父母，就是你的天和地。我们说这个，就是在某种意义上你和他/她就是一体，你和他/她的关系就是不同于别人。那是一种从哲学上讲存在论的、而不只是认识论的联系，你不是拿他/她当对象，这是我父母我怎么怎么样，你们早已经连在一起了，你想分也分不开。硬分开，像文革中揭发父母，最后河南那个律师，他母亲被枪毙。

黄：不是河南的，安徽固镇县，就是我那个县，叫什么张鸿宾，我也是后来看我才知道，当然他就1966年，我那一年出生，那么惨，我不都知道。

张：我看了非常难受。

黄：他妈姓方，叫方什么。

张：你看他后来忏悔，不但如此，他当时思想还很左，可是他妈妈被枪毙以后，他生理上都有反应，浑身发热那种痛苦，都违背他的显意识。这就是亲人的原本联系，亲子联系的根本性，不是谁的意识形态可以管得住的。

黄：好的，张老师，我现在给你讲这样的一点，你刚才讲这一点我也认可，对于基督教和中国的结合，或者儒家的特点，我现在提这一点是什么，就是你比如在做儒家的时候，讲孝这个我是认可的，但是我就想对孝，中国人讲的孝的这一套里边，有一点点也不能讲担忧，中国孝的历史这么长，有很多感动天地的积极的故事，但是有很多错误的，或者叫讲坏的东西，就在这个孝里边，今天再讲到（01：42：00）那边文章的时候他引用了耶稣说的，你爱父母胜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正常觉得好像，上帝耶稣和父母成了一个竞争者的关系，你现在给我选择爱他还是爱他，因为这样一讲的话，因为上帝是一个全善者，是一个绝对者，而父母他不是一个绝对者，所以爱他的意思，要爱他，但是不能够给他当成一个绝对者，比如刚才讲父母不是我认识的对象，是我存在关系的，他就是我的天，这个天就看怎么理解，不能够当成绝对，我们担心就担心出很多，张鸿宾是相反了，他根本没有，但是有时候相反的有很多。

张：其实孔子就要求你不能够把他/她当作现实的绝对，孔子说你父母有道德上错误，你一定要劝戒，但是不要惹翻他/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说他/她是天，就是说你永远不可背叛你的父母。

黄：就是你要孝顺他这件事永不改变。

张：对，对。

黄：但是至于孝的方法是另外一回事。

张：这是《孝经》讲的非常清楚的，反复强调的。

黄：那我想关于这一点，这是我非常关心的这一点，这一点可能要挖掘出来，因为作为我们一般外人对于儒家的孝道的理论不是那么熟悉的话对孝会有担心。

张：这或许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遗毒，他们就是妖魔化孝道。

黄：一讲孝就是愚昧的。

张：根本就不是，而且历史上我觉得主流也不是，因为我看那些古代小说，你可以看到他们父子间是什么关系，所谓孝是什么样一种意识状况。比如说我挺喜欢一个小说，清朝的《儿女英雄传》，将

来你要有时间也可以看，描述当时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低级官宦人家，他们的一些遭遇，包含着孝道、慈道、夫妻道等等。

黄：但是这里我想提一下，就是二十四孝的故事里边，他有不少按今天来讲就像超出常人想象的。

张：当时是为了宣传，可能有一些过分的东西放在里头了。而且你也要考虑它的整个故事，比如为了养父母把儿子埋掉，他最后没有埋，一挖挖出银子来。他的主要意思是说你这孝心可以感动天地。

黄：就是孝心永不改变。

张：对，所以他那个表述确实有问题，但是并不是都有问题，像舜的孝，或者其他的一些故事中的孝。

黄：或者这样的，我们给它稍微重新解读一下这个孝，就像什么呢？不是我的父母，具体的父母是我要绝对言听计从的对象，而是说我要孝敬父母的这种情感，这种态度、这种人生的存在，它是一个永恒的真理，而不是说有些人说永恒的真理，父母叫你干什么就要干什么。

张：这一点我也是从哲学上要论述一下。

黄：对，可能这一点要论一下，因为很容易就把父母绝对化，具体的父母。

张：用我的话就是把他/她充分对象化，这不行，孝的朝向主要不是父母这个对象，而是用舍勒的话说就是父母的人格。其实孝子最看重的是双方的人格，父母的人格和他/她自己的人格；他/她有自己的人格，就能发现父母做的对不对，而他/她最关心的是父母的人格，他/她不能让父母亲陷于不义，这是《孝经》里的话，让父母陷于不义，就是最大的不孝，而不是主要关注父母吃了亏或者怎么样。

黄：好的，这个孝我记得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就是说叫什么，零星式的、火花式的交流一下，这个孝与爱也相关吗？我今天也在讲，原来也提过，所谓在基督教里看来，所谓人爱神，或者叫人对于孝敬神、敬畏神、爱深是最高境界就是信神，说这个信是因为他是绝对者，他本身是完美的不需要通过我来表达什么，好像他才能够得到满足，不然的话好像他孤独似的，这里就是所谓的我们作为一个有限的人和绝对完善的上帝之间所能发出的就是关系就是孝，这是信他，因为信他我们就获得正确的地位了，因为他是真理，所以这里我觉得可能给信和中国讲的爱和孝之间，也有很多的联系。因为这里的话，假如我套着，信和爱虽然不是完全等同，但是有点相似，我想把他约等于的意思，我就讲到这个信，在基督教里因为保罗说过有三个最大的美德，一个叫信、一个叫望、一个叫爱，最大的是爱，但是路德又讲到因信成义，基督教讲信，爱首先是上帝是爱，然后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这是基督教的讲法。所以信很重要，他就讲到信望爱这三个东西其实都是信，比如说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个相信是指 (believe) 去确认一个已经发生的事件，也就是耶稣2000年死而复活了，这是一个事件，这叫做 (past tense) ，过去式，对这个信，另外我信我的灵魂要进天堂，这是指未来 (future tense) ，还有一个呢？我信神，你这有爱心，你这是又帮助朋友，又帮助那个朋友，对人负责友好的，你有爱心，因为我信神，所以你这个爱就是你信的现在时 (present tense)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讨论，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就在想这样一点，今天清华的黄裕生教授讲到耶稣和孔子的爱，我想准备写一篇文章来跟他讨论讨论，很有意思，他就信任在这中间的关系。比如在你所讲的，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想看基督教和儒家有没有一些可以相通合作的地方。因为我刚才讲在欧洲现在理性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是抛弃上帝信仰的这样一种人文至上的都是，导致现在家庭遇到了最大的挑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遇到的一个所谓在欧洲的传统，就是基督教，这个挑战者是刚才这个，而在中国的话，就是全球化的这一套东西，但是中国的所谓传统是儒家，是儒释道等等，从全球化的格局来看，基督教和中国儒家等等都是属于同一个阵营的，所以就想在这种状况，我们回到下一步，你刚才讲的你研究这些问题，我发

现你追述你自己的学术经历，和你的知识结构的时候，基督教这个东西，及其神学，什么是会进入你的视野，或者你关注过吗？

张：还是有过关注的。

黄：你是什么时候，在美国的时候还是什么？

张：我已经说到了，在我最难受的时候，我也读过《圣经》，在见贺先生之前，但那次经历中只是有所感动，但还是没有真正觉得它能解决我的问题，它好像是一个比较遥远的很动人的故事。后来也就淡忘了。到美国以后接触教会的机会就多了，几乎一到那边，就有留学生里边的基督徒来带我们去参加读经班和教会的礼拜。我印象最深得是读经班，是一个医生组织的。他有钱，但是很虔诚，每礼拜五晚上在他家里读经。去了以后，大家就唱歌，要唱很久，很感动；然后就是他来讲，或者是其他的某些人来讲，最后又是唱歌。当时我英语也不好，但是也能听一点。

黄：这是一个老外。

张：大多是欧裔美国人，也有少数中国人，一位信基督教的同学带我们过去。

黄：我是指整个的语言是用英语。

张：英语。他们大部分是地道的美国人，特点就是大部分参与者都是青年，所以美国教会的活力，我当时是感受到了。他们唱歌充满了热情，而且那个医生讲到动情之处声泪俱下，蛮有一些感染力。我印象中就是他特别赞美上帝对美国的关爱，美国人受到了多少爱，他们应该怎么样做，更细致的我当时也听不懂了。就是这样，这个印象一直特别深，已经有很多很多年了，1986年去的，等于说30多年了。参加教会的周日礼拜留有印象，去过好多次。也有一些同学，或是美国同学，或是中国留学生，跟我们交谈，帮助我们了解基督教。后来我去读博士，换了一个城市，到水牛城，那边也有教会的，有一个叫大卫的白人青年，就经常到我们家来，还跟我一块读经文，并有讲解和讨论，他特别要反驳进化论。最后，我还是没有入教。对于基督教，我非常尊重，但说实话，我也批评基督教，主要还不是因为它跟儒家不一样，而是它有不是很合理地方，就像你刚刚也讲到，儒家也有不是很合理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这两个宗教或广义的信仰传统都是讲爱的。这一点在世界的大宗教里，好像比较突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大宗教，是从根本处要讲爱的。你看佛教、道教都不是从根本处讲爱，虽然它们的团体内部乃至对于外人，也充满了关爱，其中的一些派别还有慈悲学说，也有博爱，比如大乘佛教，但是佛教总的说来还不是建立在爱之上的。所以这个是我特别欣赏基督教的，它不只是建立了律条和信仰体系，这是基督教的特点，跟其他西方宗教就不太一样，不是一个完全威权式的。首先要讲爱，我就比较感动，这个是一个我最觉得好的地方。

黄：最让你不能接受的地方，或者有批评一些的地方。

张：主要就是涉及到家庭问题，亲子关系问题，就像你刚才讲的，基督教认为真正最原本的爱是神对人的爱和对神的爱，而我自己的经历或者儒家，我现在认同的儒家是认为亲情之爱，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从亲情之爱知道什么是真爱，这个真爱可以最后转向神，但是你如果一开始就是去爱神，这个爱实际上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我们这种人的本性就是要从亲亲来形成对他人和世界的看法。你没有原初的经历，没有从最切近的爱来知道什么是真爱，那个爱就可能是被某些教会或者是某些机构操纵的；尤其是，这个教会说应该这么爱神，那个教会说应该那么爱神，他们两个打架，我们该怎么选？可是我的父母我没法挑、没法选的，所以我跟父母的关系是最天然、最自然的，这种爱也是最自发的，从这里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所以这是我最犹豫的一点。其他的就涉及宽容的问题，当然在这方面我觉得基督教已经改进了不少，但问题还是存在，就是把不信我的人都説成你们要下地狱，甚至是受魔鬼的指使，这个就是我当年的一个心理障碍，就是说，我父母不信基督教，我要信了基督教，我就要认可我父母要下地狱的事实，可那是我的至爱者，我怎么能够接受这个呢？所以这也是一个，不过这个可以再解释，

做出某种协调。但是我从理性考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个亲爱的地位和神爱的地位的问题，虽然这个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不冲突的，就像你说的，实际上在西方现在维护亲爱的主要就是教会。

黄：教会扮演这个角色。

张：我承认这一点，但有的时候确实也是冲突的，而且两边的最后效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特别看重孝道的问题，我要把它的真正的哲理解释清楚，把很多罩在它上面的误解清除掉。

黄：《圣经》里有这样一句话，专门就是说怎么样照顾寡妇，怎么样照顾这样的人的时候，他就提到一种状况，那你家里有经济能力的这样的人，都要先照顾自己家的人，不要让教会来照顾，就像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连自己家都没有照顾好，还怎么去照顾别人，跟别人说爱神，还有一个他也讲，这是照顾弱势群体的人，那另一个，他就讲你要做神职人员，做神的仆人，你要先管好自己的家，连自己的家都管不好，你怎么去管神的家，这也是很重要的理论，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关于神爱和亲爱，亲情之爱的地位问题，我的感觉这可能是有很多解读上的问题，从我的理解来说，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挑战，对于我来说恰恰是丰富和坚固我的亲情之爱，这里当然可能是因为对神学的解释问题，所谓的神学解释问题，有一些可能是理论的解释问题，另一个可能是你见到的基督徒给你解释的问题，在我看来他可能解释是不符合我所理解的神学的一个原意。

张：我希望将来中国基督教的中国化，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有突破，说清楚。

黄：我们俩把这个好好整理整理，我想我翻译的芬兰学派，它叫做路德研究的新诠释，这个芬兰学派，它三本小书，其中一本就叫《两种爱》，我今天简单提，我想这个出了之后，想办法能让你来读一下中间这本小书，在上海三联出的，这个对我影响非常深刻，在芬兰影响非常大，那就是我看了那个是很感动，他是一个完全的理论的、神学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的话，我觉得只从这里可能和我们将来孝、爱和家庭、亲情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的对话。

张：另外，我跟基督教还有一个缘分，就是我对神秘主义的研究，也就是基督教神秘主义。这方面我还出了一本翻译的书，书名是《精神的婚恋》，实际上翻译为《精神的婚礼》也可以。说到这个缘分的形成，一个原因是我已经讲过的，就是我对道家感兴趣，因为我天性就喜欢自然，从小就总到野地里去玩，所以我不特别喜欢分析化的哲学，虽然我也有那方面的训练。那种形式化的、概念化的论证，除了康德那样的，前期维特根斯坦式的，大多是思想贫乏的表现。我更看重直觉的方法，或者是有些神秘的但又不违背理性的思想闪光，像帕斯卡、诺瓦利斯、庄子、孟子、胡塞尔、海德格尔等等。所以我长话短说，有一个机会让我到比利时研究了吕斯布鲁克，他是中世纪那个地方的神秘主义者，就是基督教当时当然是天主教的神秘主义者。我是挺受触动的。为什么我跟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之间，有一些可以深层沟通的东西？就是因为他们最看重的还是活生生的体验，与神相遇或者是我爱神、神对我的爱，这个爱可以体现为我的人生中的那种火热的感受，是直觉的、直接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跟你说过的，我年轻的时候，实际上也有过一些这类体验，包括我读斯宾诺莎时都出现过，而且往往我那么喜欢自然，我到自然里边，有时候就出现那种状况。

黄：出神入化。

张：就是能感受到一些特别根本的真理，没头没脑的就感受到很根本的领悟，让我的人生充满了最根本的含义和让世界有意义的那么一种东西。所以我搞那个研究，就感到很有趣，因为它对于教条的依赖少，而对经验的这种开启或者经历的比较多，和艺术也相通，其中我读到一些神秘主义者还写诗，比如一位女神秘主义者，哈德薇希，我也很喜欢她的那些诗，写得很美很感人，呈现她跟神相遇时候的体验。

黄：你现在这个对你确实有生命体验的，是有一定的震撼的。

张：对，就是说有感通，也有不少收获。

黄：我也是，我在《道风》上原来发过一篇文章，就是研究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 c. 1260 – c. 1328）的神秘主义。

张：他也是这种路子。

黄：路德是很有意思的，路德他是一个受经验神学的影响，他的老师都是经验神学家，另外受德国神秘主义的影响，神秘主义是他很重要的，也是很有意思的。

张：我听说过，所以我感到神秘主义不光是基督教现象，道家有道家的神秘主义，甚至我觉得儒家也有神秘主义，比如像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出神的、被音乐打动的特别深入发作的状态，持续了很久，更不用说佛家和道家。这种神秘的艺术体验往往成就伟大的艺术家，灵感来的时候就进入那种出神的状态。所以这是一个普遍的人类现象，像柏拉图就讲迷狂，今天会议上徐凤林教授讲到东正教经验中的迷狂。迷狂作为一种神秘体验，是必要的，与宗教、艺术的最高体验时刻相关。你说那个醒觉指什么，就是在说这种神秘体验，实际上它恰恰是人的灵性的一种表现。我们意识的根本是内在发生的时间，恰恰是因为这种时间在人这里非常深、非常长，所以可能产生那种意义的漩涡和极度涌现，表现为这种神秘的出神状态。这种经验从有人类以来，没有历史记载之前，我们都可以推测是在场的，因为最早那些人类记载，包括《吠陀》和《奥义书》里，都有这些东西。

黄：你讲这一点，我回想起，刚才我问你有没有接触到基督教，从实践到理论，然后你的评论和反馈，那我再来回顾一下，比如我自己在思考儒家和基督教这两个传统，对于我个人生活或者生命体验的影响，应该说我是一个儒家受影响的，我是不知道的，在中国出生，我想我上大学的时候才开始读《论语》的原文，比较长一点的原文，中学就读小片段，我大学读《论语》的时候，我第一感受是孔夫子讲的话怎么都是抄我爷爷的，我感觉都是抄袭我爷爷的，我爷爷是一个文盲，你就可以想象儒家对我的影响多大，因为他讲那些东西，我知道，都是儒家的《论语》里面说的东西我都知道一样，就是我早就听说了，你这想想对于我的影响是这么大的，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我搞了两篇博士，两个博士论文，一个哲学的，一个神学的，我是先做的和你有点类似的，我做的老子，我的第一个博士论文，然后后来做（02：04：59）老子，在日本东京大学做的博士后，张皇学派的呢中东西，后来我又做了一个系统神学的，就是那本书，你来参与给我写这个书评的，就是儒家和基督教对话关于救赎的问题，我在博士答辩的时候写过一篇小论文，我就在谈到一个问题，我以前在接触基督教之前，我是要走内盛外网、穷达之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我靠的是读圣贤书，四书五经，虽然没有读那么多，但是我的理论是这样的。

但是后来我想解除了基督教之后，我还是要走这条路，我要走进入永生、进入天堂的道路，我靠的是读《圣经》，这样搞了10几年，读了《圣经》10几年之后，在2006年我再发那篇文章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有问题，因为我以前靠的是四书五经，现在靠的是《圣经》，主体都是我，这个是基督教的本质不是这样的，我要向走向成圣，走向与神合一等等，进入永恒，是圣灵借着结果子，不是我在上帝的帮助下干好事，而是上帝把我做成一个工具来做出好事，这是我当时一个很深的体验。所以这样回来的话，对于我来说，我经常和搞儒家的人开玩笑，我说你不要把我开出了，我说我是儒家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儒家对于我来说，我是可以接受的，我自认为我是这个儒家的信徒，但是我指的就是指儒家他讲的主要是人伦，在天人这个方面上，我自己感觉儒家挽救不了我，而我对基督教，恰恰基督教最最吸引我的就是让我能够突破，从下往上走不通的路，他有从上往下的这条路径，让我解决这个终极关怀的，你讲的他者，或者讲绝对、至善这样的东西，所以在我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儒家和基督教这两个体系是不矛盾的，是各有所思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有从宗教、历史、文化的实践中和历史中都是各有各的问题，这个问题有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有人误解的，另一方面是教义本身没有问题，是人的问题，他人的问题。所以就回到这里，你刚才讲的，我们再回那个问题，聊这个问题，你对基督教的接触，然后你的思想上有哪样几点，你特别赞赏他的爱，然后又讲对亲情致癌比较弱，那我自己的这

个感受，我的感觉是因为可能很多的误解，我指的是其他的学者们写的文章，甚至是教会官方的教义的缺失上，可能误导了你，因为在我看来，你讲的那几个问题对于我来说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一定上和你一致的，我是非常的注重亲情的，我在我们家也是，我们家姊妹五个，我是老三，在我们家里的弟兄姊妹中间，我叔叔、我爸爸就是弟兄两个，我叔叔有三个儿子，所以我们家你知道排位都是怎么排，就是喊什么，大家都喊我喊三哥，我的堂弟他比我小几个月，同岁的，他是我叔叔家的大哥，但是大家都喊他四哥，就是这样排下来，他的弟弟大家喊五哥，然后我的弟弟应该是下边的老四，被喊成六哥，也就是说我们家九个孩子，我叔叔家和我们家是排在一起的，是不是比较典型的反映中国传统的那种大家庭的。所以四哥、五哥是这样的，很有意思，所以我在家里也是大家聚会我就是太操心，就是要管这个、管那个，这个弟弟怎么样，那个妹妹怎么样，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东西儒家的，确实是非常的强烈的。

张：你老家是哪里的？

黄：我是安徽蚌埠出生的，后来在北京上，然后再到芬兰，所以是这样的。所以这里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想我可能，我正在思考，你像儒家和基督教的对话，我想大势是这种状态，不是任何个人都没有办法来扭转这个局面的，一个是基督教在全世界的状况，另一个是中国的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今天中国的发展，所以我们如果引到下边这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的话，就像我们现在在现在的语境中，那是不是我的感觉可能，要谈我有这样一种感受，说不定就是把基督教里边的爱的概念，和儒家里的亲情、孝、爱、仁这些东西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理论，然后遇到的语境就是那种不要上帝的理性主义，所谓的现代性等等，带来的对社会正面的好处的同时的消极，甚至我们叫人工智能可能毁灭人类的这种危机，这些东西合在一起，这两个大的，这种大的冲击对欧洲和对中国，我认为是类似的，都是很大的，那在欧洲那边可能就要用的是基督教来迎接这个挑战，在中国可能就是儒家的，或者中国传统的应对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和基督教是应该是否尝试努力做一些合作，做这个合作的话，我们就要经过利玛窦时代的那一块，再经过清华、北大那个20年代的飞机运动，50年代的三字运动，再讲新儒家和基督教的对话，我觉得我们到现在我们这个对话应该是在他们的基础上朝前走，不是简单再去重复他们的问题，甚至倒退。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怎么样能够做一些深层的东西，假如说时代赋予我们这个使命，我们就活在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时代，我们能做些什么，在前人的基础上，不要浪费掉了。

张：我觉得你提的问题非常好，你抓的那个点也正是我觉得应该抓的，就是亲爱 and 神爱的关系，我们应该通过各自的反省和对话，最后这两者是不是能有某种内在的沟通，就是不以损害对方为前提，也不放弃自己。但是要力争做到不损害对方，比如说神爱以他更高的原则来把亲爱贬低，就像基督在新约里的某些话。

黄：本意不是贬低。

张：但是表面读起来是这样。你看今天黄裕生 [论述耶稣和孔子的爱的] 文章里面引用的话。

黄：所以后来我要加一下解释。

张：倒过来看，亲爱里头也不能没有内在超越的东西，也不能没有是非，我们刚才也讲到过这一点。所以这两者之间有沟通，神爱体现亲爱，亲爱这边也有神圣性，有跟上帝、跟神的联系，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神秘主义的一个原因，希望从这里边找一些相互可以借鉴的东西，因为通过这种神秘的体验，跟神的那种相遇，表明神爱跟我们的亲爱并不矛盾。我觉得在根本上，不是那种爱谁更高、更低的问题。还有一个例子，不知道你关注过没有，就是美国有一个基督教团体，它在欧洲曾经是异端，就是阿米什人 (Amish)，他们在我们刚讲的这个问题上有些特别的见地和解决方式。

黄：拒绝现代化。

张：但是他拒绝现代化的考虑，跟我们特别关心的问题即亲爱与神爱或家庭和信仰的关系有关。这个团体我自己去看过两次，在那边读研究生的时候去过一次，前年我去美国访问时又去看过一次。当

然去看阿米什人的居住区也就是那么一会儿，留一个印象，真正要了解他们，还是靠读了关于它的几本书。有一本是2013年出版的，比较新，写得相当好。就我对于这个社团的了解，他们对于我设想的儒家文化特区，是一个积极的证明，提供一个支持。这里头很关键的，就是他们对于神的信仰和他们对于家庭看法是内在沟通的，是结合在一起的。就我的观察，他们并不认为为了神可以牺牲家，而是强调这两个缺了任何一个，那一方也就不是真的了。对于这种见地，我是很欣赏的。为了维护家庭，他们拒绝很多现代技术成果。假如说家庭对于他们不是那么重要，就像在美国的很多教会的态度，他们完全可以拥抱现代技术，因为神是超越的，人们使用什么样的技术，把那个地方变了样子，但神还是神。但是你如果有家，或将家看得与神一样重要，这就不一样了。有的阿米什人当面对我讲，而且我读的相关书籍也是这么讲，就是说他们为什么不用汽车，因为用了汽车，年轻人能到城里去工作，虽然他可以白天去晚上回来，但家庭的关系一下就拉散了，或冲淡了。为什么不用电话？也是出于这个考虑。为什么不用电动的打谷机和烘干机？因为要维护家庭和邻里关系，到收割的时候要大家互相帮忙，你要用了那个，我一家或一两个人就能收割了。这些技术在隔离我们。

黄：他们这一套生活方式背后有这样的。

张：总之，我问他为什么不用现代技术？人家给的理由，一个是信仰，一个是家庭，家庭特别重要，因为家庭是活生生的，就在这里，需要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接触和共同生活来建构，而高科技在这些对家庭重要性高度敏感的人们眼中，造成的损害是看得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社团和我设想的儒家特区，在这方面确实可以互相借鉴，虽然还是不一样，但是相近到了这个地步，已经让我觉得跟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心理障碍。知道双方的区别，但是已经觉得很可以有相互的深层理解了。我对他们很佩服，从心里佩服。

黄：你在讲的我也是有两点反馈，一点就是说你要讲的儒家文化特区，是与这个你的观察也是有关系的，这个儒家文化特区一个是 Amish 的影响或者参考，第二个就是你在做儒家文化特区的时候，也是以家庭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张：当然，绝对是一个源头、根本，是这个社会的根本。

黄：这是一点，第二点你和 Amish 感觉有一种深层的理解，或者同情的这种感觉，甚至认同的感觉，那同样德沃刚才讲的，我这个追述现在所谓世界的全球化的大局面，就是理性主义可以，现在搞人工智能，越搞都不知道搞到哪里去了，所以在欧洲的话就是教会和它之间的战争，在中国可能就是乳胶等中国文化传统和它之间的平衡或者是这样的状况。

张：中国这边儒家太弱了。

黄：那就是有一系列的东西。

张：基督教毕竟还有组织，还有重大影响，虽然听说在欧洲年轻人信的越来越少。

黄：也有这种状况，但是它也有另外一种状况，他不是以大聚会的形式，用其他小聚会的形式。

张：那就好，前些时候我们开会，国内的不少学者就公然宣称基督教在欧洲已经消失了。

黄：没有，它是另一种形式，也是对大教会或者权威的一种反抗，然后以其他的形式，就因为大教会世俗主义太厉害了，大教会已经不是教会了，已经向社会世俗主义妥协了，所以让很多人反叛他，这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所以这样的大语境中，我觉得再加上我刚才讲的追溯中国的历史，明末清初的这一段，战后中国怎么，多少年新儒家这一段，然后我们现在到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完全是机缘，你搞这个，我搞这个，我们两个碰到一起，你像我在中国这么多学者，能像我们这样深入聊的人并不是很多的，所以我想我们这样做，这样做之后，底下我要一点互动，互动之后，体刚才讲的，我自己要建议，我们可以将来再做一点合作，有两件事情可以合作。我发现路德那个体系中，一个我讲的芬兰学派有一本小书叫《两种爱》，他的书，他就把爱分成两种，一个叫上帝的爱，一个叫人的爱，人的爱里边就包括情爱和人的一些这样的爱，所以它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书在很多的，在香港赖品超他们的中文

大学，然后香港的(02:19:50)的神学院等等，他们都在用这个，全世界非常注重，我觉得这个但愿对你会有这样的启发，像你刚才讲的情的问题，你在这里就能看到，他讲上帝的爱的时候，强调上帝爱的时候，不是以牺牲或者排斥人的爱，以及认得情感为前提的，也不是以这个为目标的，他只是两个是互补的，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讲的关于家庭，结合同性恋家庭等等这一系列新的家庭的挑战，和你这个 Amish 的经验，所以我讲我翻译路德的那个30多万字的这个，我是准备等这个书弄好了之后，到时候我们搞一些小的工作坊，可能人不要多，就4、5个人，5、6个人，这样看看我们来谈一谈，这是我这样一点想法，具体我们看看能不能这样深入，神爱、人爱、家庭。

张：是的，反正你那本书出版后，请给我一本，我先好好看看。

黄：好的。

张：我也是有兴趣，确实有兴趣，因为怎么理解这个爱，对双方都是源头性的问题，而且是双方可以沟通的地方。如果这个地方有相互理解，那就是一种根本性的沟通；但如果这地方有误解，那就又是一个根本性的阻隔。

黄：那没有关系，我们把它找出来也是一个重要贡献。最起码从你刚才讲的，在我的体验里，因为我也是，我对儒学研究没有你那么深，但是我的生活的经历和我的学术的经历，儒家是我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两点我们来在基督教、神学这个是我的一个部分，这两个的传统，我觉得我们来真正抓到问题在哪里，是真问题还是假问题，是误解还是根本不可调和的，但是你刚才讲最后的那一点，我们讲基本原则及这是我非常认可的，因为我写过一本书叫做《对话神学》，就是出去讲各种各样的理论之外，还有多元主义、包容主义、排他主义，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个殊论(particularism)重要的前提，今天我们对话的目标，我不是要向你推销我的理论。第二我不是要来证明你的理论是错的，这两个点都不是我的目的，我的主要目的，今天晚上是我想要认识你，你的体系到底是什么，第二我同事也告诉你，我的体系是什么，等到我的体系讲出去的时候，你要么是没有理解，要么是不能接受，你你给我一个反馈信息的时候，你不理解或者不接受，甚至包括你接受的时候我都要反思，你所理解的是不是我所讲的，你所反对的是不是我身上真有的，你所不能理解的，不是是因为这个东西不能够被理解，还是因为我没有表述好，我把你的这种三种信息，正面、中立和反面的信息拿来之后作为一个重要来重新反思自我，反思自我就是要看是不是我真的有错误，或者说我这个理论体系本身没有错误，但是因为我没有表达清楚，那然后我再换一种方式来表达，所以当你来讲你的理论的时候，比如刚才讲孝、家庭这些东西的时候，首先第一条我不做判断，你是对和错的，我是表示尊重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当我们讲你的东西和我的东西是否一样的时候，又回到我讲的三种方式，然后我们就来反思，所以这个对话的目的，最起码对于我来说一个最重大的好处，用功利主义角度来说，能够最终是帮助我更好的认识我自己，然后来完善我自己，这个完善是指多方面的，也包括表达的完善，同样的也来认识你。

张：好。

黄：这就不是传统的我们称为叫做particularism，不是传统的比较，比较是异同，更不是那种所谓阶段论的比一个高下之分，更不是这个，而是因为我们现在有encounter(相遇)，我们俩相遇了，出现这个相遇之外还有一个叫engagement，我们有可能要打交道，要在地球村里面打交道，我们不仅仅是个人，是我们代表的传统，就是需要这个dialogue, engagement,你不能说我把对方消灭掉，那又要打交道，也不能说老死不相往来，要打交道我们就得看，到底哪些方面可以。

张：是的。

【黄保罗教授曾就此题目发表过一些文章，如黄保罗2020：“中西经典中的孝观念比较辨说”，《华夏论坛》(A Journal of Huaxia Forum)，2020年12月，第24辑，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页26-39。ISBN 978-7-5692-7900-9。】

五、儒学复兴与儒家文化建设特区

黄：是这样的几点。好的，其实我本来还想问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在一定程度上是回答了，是不是在现在的语境中我们来谈国学复兴、儒学复兴，在中国的比如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这样大语境和全球化的语境中，你对现状有一个基本的描述和未来的展望，出去刚才我们谈了很多的家庭的问题之外。

张：长话短说的话，我觉得儒家的复兴或者国学的复兴应该怎么走，我和很多对儒家和国学抱有好感、甚至参与其中的人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特别看重最基本的生活的实际经验，而不是特别的一些安排，觉得那些东西虽然也重要，但是应该是从这个根子上生出来的。比如说制度，甚至所谓的心性，这两个都很重要，谁也能看得到，但关键在于，如果家庭、亲情这个根源丢失或者是被严重损害，那两方面实际上是无本之木。所以我觉得未来如果儒家要复兴，一定是要想得深透，使得家庭或者是以家庭为根的社团（community）有一个复活乃至复兴的机会。大的社会现在正被高科技、全球化一就像你刚才说到的欧洲也是这个情况一在拉散，资本掌握的高科技或者是那种异化的力量，越来越能操纵人了。新出来一个手机，好像我们大家都得买，将来人工智能出来，把我们的工作替代，它来豢养我们；我觉得应对这样的东西，个人是没有力量的，个人只能作为思想者来探索这个问题。需要的是像阿米什人那样，形成一个信念社团（community），大家一起保持某种我们有内在活力的自身生活。而要达到它，只有靠家庭联合体才行，它是社团的根基；反过来看，家庭要在这种社团中得到新生，就是家庭能够重建自己，从现在这个比较异化的状态，回复到健全的形态。我不是说完全回复到以前，比如完全模仿传统的大家庭，关键是怎么调试，最后让人们觉得他们生活在一个比主流社会更幸福的社团或大家庭中，得是这个感觉才行。不能说我还得勉强我自己，按照某种现成格式，勉强强地凑合，这个不行。只有真的合乎当事人们的生活期待，才能维持长久，就像阿米什人那个社会能够维持，从20世纪初的几千人，发展到2013年那本书统计的是28万，翻了很多倍。而且，因为20世纪出现了现代技术，汽车、拖拉机等，关键是燃料动力的机器，还有电话、电报，多少研究他们的专家都曾预言，这个社会肯定要消失，因为它将顶不住现代技术的冲击。年轻人不会喜欢你们这么落后，用马拉车出门，穿着传统服装，不用电力，但是这个预言到目前为止全部破灭。可见我们人的本性中有一些使得他们，包括一代代的年轻人，就是喜欢这个生活，关键问题就是你这个生活得合理，合乎人的本性，才能留住年轻一代。因为阿米什人社区旁边就是主流社会，他们的年轻人跟外头社会也有某种联系，而且由于他们是再洗礼派，要让人在18岁时再选择一次信仰，直接关乎他/她是否留在自己的社团里。在这种并不完全封闭的情况下，他们还能够人口这么增长，说明这种生活的持续确实是可能的，即便在这个现代社会中；关键就是你里头的整个生活的组织安排、技术的使用、人与人的关系，都能达到一个最佳状态，也就是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维持得最好，而且生态环境保证的最好，人也不能太劳累，生活又很美好，于是构成了一种品质比较好的生活，还有闲暇来进行文化活动等等，年轻人觉得我在这里头活一辈子很愿意，这个才行。所以我是觉得儒家未来的复兴，就是要有这种哪怕是一个小社会，但是它让我们产生希望，对于未来的希望。

黄：就像您讲的儒家文化特区一样。

张：像一艘方舟。我是觉得现在整个主流社会在走向不太好的一个前景，因为人逐渐在失去对于高科技的真正的控制，而这个高科技给我们带来的，我看到的是危险多于机会。当然出现了很多机会，没有问题，但是那个危险也越来越大。所以我们需要这种方舟，不是光是为了逃难，而是为了我们有一种更好的生活的选择，这是一个考虑。第二个，你通过这个社区的示范，对于主流社会也会有影响。美国的主流社会，就像2013年那本书说到的，在20世纪前一大半，对阿米什人的看法负面的多，觉得他们是怪人，他们是不可理喻，是反民主，是反个人自由什么的，但是这几十年来，他们反而看到了阿米什人的更多的好的一面，还是那个社会，在事实面前和时代潮流的变化面前，已经开始有转变。

黄：我看过好莱坞的电影介绍的，也是那里面有个人怎么和外面解除了，就抛弃那个地方，最后发现他的根，他还是回去了，有这样的电影。

张：所以主流社会也开始对发出它越来越多的肯定的声音。我这次去的时候，一辆一辆大巴，拉着游客去他们的社区。

黄：去参观的。

张：可是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去阿米什人的社区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见到有什么人去参观，就是我们几个人自己闯进去看，所以可见主流社会也可以改变的，关键是你做出了示范，不是靠教条去跟人家辩论。要改变一大群人对什么是好的生活的看法，你辩论不了，这点我很清楚，这是不可辩论的。

黄：对，他是弱勢的，面对强大的媒体它一定是弱勢的。

张：只有显示，show，把你的好处显示出来。

黄：我们叫见证出来。

张：如维特根斯坦所言，生活形式或生命的逻辑形式不可被说，但是可以显示。最重要的一些东西是说不出的，但是它自我显现出来。

黄：显示出来。

张：所以我是觉得制度和心性虽然都重要，但是最关键是我们将一种原发的儒家的生活重建起来，让它向社会展示一种美好的生活。哪怕就是建立一个特区也好，或者在主流社会的旁边搞，先从书院开始，然后教育人，组建自己的团体。我觉得中国政府应该支持，它不要对儒家有戒心，儒家是相当和平的。你为什么允许的那么多宗教的存在，但现在就是不允许儒教的成立呢？所以这个再看吧，希望慢慢的有变化。

黄：但是现在有很多地方，穿汉服，搞什么这些东西，这个状况，但是我到山东看一个段延萍，他搞了一个叫曲阜国学院，就是办了一个小学，孩子们都穿这个服装，什么琴棋书画这些东西，有这样一种，学生们在那生活相当于，是有一点这个意思。

张：能培养一些种子，但是这些东西也都很脆弱。

黄：这里有不少好象有一种商业化的东西在里面。

张：也有鱼目混珠的，所以读经运动也受到挫折。一个是商业化，一个是他们那种教条化的教法也引起家长和学生的不满意，所以这些东西都得摸索，找出一种或多种成熟的、可行的方式。

黄：您本人除去在理论上的研究和探索之外，您在实践上是试图给企业家或者政府联系一下，来推动这个儒家文化特区的建设吗？

张：他们如果问到我，也的确有人问到过我，我也会尽量讲。但是我觉得我目前的主要使命，作为一个思想者，主要还是把这个问题想通。你写出书来放在那儿，或许有人愿意读，受到启发就可以更深入地思考，甚至去实行。这是我们的本分，而成为活动家确实不是我所长。

黄：所以您的定位主要还是学者、思想者。

张：另外在力所能及的时候，我也愿意、甚至做过尝试，比如我儿子的结婚的时候，我为他/她们设计的，就是儒家的婚礼，后来有人搞到网上去，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那个婚礼，实际上就是一个小时，很简短的时间，让孩子拜天地、拜父母、拜至圣先师，要有神圣性、亲情，夫妻之间也要有他们的那种亲爱，从传统的像朱子家礼里面，我吸收了不少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尝试。对有些人做出的相关实践，我也很尊重，像山大的颜炳罡教授和社科院的赵法生教授在山东搞的乡村儒学重建，就是一种很有益的探索。

黄：民间儒学还是乡间儒学。

张：对，他们搞一些乡间儒学，我很尊重和支持，很希望能搞好。但是依我个人的预测，不叫预测，就是我的观察，好像他们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因为我知道，你要做一般性文化复现尝试还可以，只

要搞深入了，比如你要恢复家族，儒家当然要恢复家庭、家族在社会中的根基地位，这个就是挑战了。光宣传一些孝道还可以，但要落实到社团结构上，就不一样了。

黄：形式具体化。

六、儒家教育和芬兰教育中的“学以成人”

张：对的。很多事，大家都在努力，比如说还有一个例子。我有一个老的朋友，忘年交了，叫冯哲，他办了一所书院，叫四海孔子书院。

黄：我见过他，我有他微信，他还邀请我到北京去看他，我还没有去过，我什么时候去看。

张：应该去看，我可以介绍你去，他办的四海孔子书院很成功。到目前为止，他是打了擦边球，完全民办，有自己的儒家和国学的追求。但是跟主流教育是什么关系，这就不容易，尤其是家长，要关心孩子怎么跟主流教育接轨，将来怎么考大学，而且国家承认不承认你的资质？但他居然就得到了教育部的批准，是完全合法的，也很受家长们和学生们的欢迎。

黄：是小学、中学。

张：是从幼儿园开始，小学和初中，现在又要办高中，跟大学接轨。对这一类实践，我也是从一开始就支持的。

黄：好的，我要去一下，我有他微信，有一次在世界儒学大会上认识的。

张：他是特别能成事的一个人，志向坚定，又能在体制边缘上行走，别人觉得不太可能的事，他也就办成了，因为他的这种诚恳。

黄：他大约有多少学生。

张：现在有几百人了。

黄：规模不小。

张：我前些时候还去过一次。现在媒体和国家的有关方面对他有所关注，以前曾有过怀疑，教育部门经常派人过来看，也不说话就走；现在是《人民日报》和国家的媒体都报道，以正面的方式报道。

黄：现在是这样，我就了解你的做的工作，还是我们回到讲现状和展望未来这一点，现在据说教育部要搞叫传统文化进学校，要提倡大面积的这种来读传统经典，包括当然以儒家为典型，你对这样一种状况是怎么来观察的。

张：我个人觉得，总得来说当然是好事，总比以前的那个状态好。以前的那些教材里头，反传统的东西，像鲁迅的东西或反国学、反儒家的作品，很多很多，充斥在语文教科书或者是孩子们的读物里。说实话，我对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流文化和文学成就，是不怎么看重的，我觉得孩子们没有必要在他们小学和中学的阶段，来学这些无根的东西，等他们大了自然就能看了。这个阶段应该主要学习经典，以我们自己的古代经典和精品为主，这是我们的文化的正脉，还可包括一些其他文明的经典，那些东西学好了，现代的东西顺手牵羊也就学会了。当然可以加一些现代作品，但是要有选择，反传统的不要收。所以，如果说在教材中加了很多国学的、古典的东西，我个人当然是支持的。但是我觉得这种改变也要尽量做的自然，要让孩子们喜闻乐见，而不光是灌输，这个当然有很多的策略和技艺在里边。我觉得，像冯哲他们的书院正在实践的那些做法，效果比较好，孩子们也能够接受，虽然要背经，但是他也学习现代的知识如英文和数理，以及传统的六艺（如射箭、书法等）。

黄：琴棋书画。

张：甚至包括农艺，总之就是自然的和技艺的，还弹古琴等等。孩子们受这些教育，同时也不耽误学习未来有助于学生们进入主流的数学、物理这些东西。重要是怎么才能结合得好，最后成为一个真正有中国自家特色的教育模式，把它摸索出来。我个人是赞同这个的。

黄：我觉得可能也有人看到，对这个问题是有一点警惕或者担忧的。

张：担忧在哪里呢？我有些好奇。

黄：你自己觉得你对这个东西有没有担忧。

张：原来我担忧的就是完全去掉传统。

黄：我指现在开始来读传统。

张：我唯一的担忧就是他们有时候太教条，比如教学的方式呆板或者材料选的不够好，不是真正的儒家经典，就只是有一些比较表面的古代文学的东西，那是不够的。孩子们还是应该把又有思想性又有文学性，总之是经典性的那些作品学到手。

黄：据我的了解和观察，不知道是不是对，可以供我们来参考分析，我觉得可能是几个，一个是在京师大学堂成立的时候，是光绪帝他在那谈到，就是说要学这种所谓的师夷之长以治夷的那种路径，也就是所谓现在科学技术等等，就是器层面的东西，因为传统的经典不能够解决行而下的落后挨打的问题，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人担心把中国传统中的一些腐朽的东西，比如说孝，有人就讲，他有一个问题，他讲孝的腐朽是什么，二十四孝里有一些故事，让你割肉什么这些的，这些所谓的传统的这个糟粕的问题。那么第三点，就是谈到教育的目的，所谓教育的目的是学以成人还是学以成才，因为现在社会总体的关注是学以成才，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好学位，将来有一个好文凭，找一个好工作，能挣大钱，这是全社会总体的关注。但是那么我们传统的孔子的教学思想，其实讲学以成人，那么这个状况，我自己也是关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芬兰教育被号称全球第一，是中小学教育，当然大学教育也不错，从幼儿园到中小学，现在芬兰教育是品牌，世界各地的人，包括中国人都到那边去学习取经之类的。

张：好在哪里？

黄：首先他是教学生，是让学生成人，而不是成才，成才是第二位的，所谓叫做学以成人，什么叫人，就是人格建造、情商教育、幸福教育、创新教育等等这些方面，然后其中重要的注意的方法是喜乐，学习是寓教于乐的，然后学习的主要方式，特别是年龄轻的孩子是玩的，他不强调竞争，强调的是合作，不是用盲目的那种鼓励，包括对老师、对学生都是，老师基本上是从从来没有奖金的，也不拼命词什么优秀怎么样，就是非常非常的，所以他用的这样一种方法。

张：就是诱导，不是强制。

黄：对，然后他这个教育学里面出现一些悖论的现象，从幼儿园到小学，就是教的少学的多，玩的多、上课少，老师讲的少，学生主动的多，就像这个悖论，家庭作业少，但是小孩学的好，这个还是方法，合在一起最主要的目标是把学生培养成一个人，所以这样的人的话，就是学生学什么东西呢？他就注意特长教育，这其实也是孔夫子的思想，特长教育是指有的人文化课是不行的，天生他就不行，数学不行、物理不行，这有可能，也有人语言能力不行，但是这样的人并不就是说朽木不可雕也，他也其他的，所以他所说的学习的知识，并不是指书本知识，也不是我们传统的科目，大家可能注意到，我和尤西林教授去年写了一篇文章，我们俩也是这样对话，后来改成文章，在陕西师大学报上发表的，我们待会加微信，我发给你，就是芬兰教育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些方法，但合一起它的最最重要的就是说学习对象被扩展了，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叫做跨学科学习，叫做现象教学、主题教学，是这样的等等这些特点。但是，合在最最根本的一点，他是把学生当成一个人来培养，而不是当成一个才培养，当成才那是高中以后，初中上专业学校了，高中以后，让人享受，特别注重joy of learning, innovation, happiness这样类型的东西和概念，所以这个合在一起，我要讲的传统的儒家这个教育里边，我觉得你比如说六艺，六艺里边其实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是技能性的，骑射、琴棋书画，因为现在我们中国，按照我讲芬兰这一套教育，在中国，我研究一下中国的教育大纲，教育部发表的这些官方文件，被称为叫核心素养教育，但是在中国很多比如学钢琴的、体育的，其实还是一种技能教育，好

像你这个，现在的女孩子年轻的时候要学礼仪等等这些东西，但是芬兰教育他注重不是这个，他注重是品格、人格的建造，我用 *personality* 这个词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就是一个成为一个独特的我，首先独特我就是要，我的身高就是这么高，我会干的事情，我的特长是干这种类型的事情，我首先要来认可我自己，我不要来不认可我，为此感到沮丧，我不会为我的家庭、为我的长相，为我的不会数学而来否定自己，是找出我，我有存在的理由，按照这种的说法，我出生在这里，那就是上天给的恩赐，所以我首先要做一个叫做宏大和谦卑，所谓的宏大就是我能 *to recognize the greatness within myself*，从我自己的里边找出宏大和伟大来，别人看我一无是处，但我知道我不是，我是有伟大的地方，这样就建立一个健康的自信。

第二条，*To recognize the greatness within others*。在其他人身找出伟大来，你不是老子天下第一我最牛，其他人也有很多好的东西，这是他谦卑的 *humility*，不是谦虚，不是说你能写字写的很漂亮，请给我写一幅字，不，我写的不好，不是这个假客气，不是那种谦虚，而是我认可我不是天下老子第一，其他人也是有他的可取，所以这个基本人格建造就是一个宏大和谦卑，这一个悖论结合在一起，有点像我们中国讲大道中庸的状态，底下再培养什么，勇气，审慎果断，毅力、公平等等这些东西，有点像我们的政治学道德品德课讲的东西，是牵扯到这些东西，然后里面还有什么，好奇，好奇是很重要的品格，然后引起兴趣，然后好学等等，幽默，然后你在生活中遇到各种苦难。

张：德国在中国现在也有一个学校，叫华德福，我去看过，基本上跟你讲的相近。中国的教育，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很有一些问题，因为这是总体制的某种投影，所以有不适合教育的内在逻辑之处。你刚才说的最大的，把孩子作为一个人培养，还是作为一个才培养，这是一个大问题，很难在短期内一下子纠正。国家的目的现在是强国，需要的首先是才而不是人，但是也有些调整，就像我们刚才说到。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引进国学、引进儒家的一些东西和教材，我觉得这个恰恰不是往才上去加强，而有可能往培养人上加强，因为儒家还是要从培养人格和人的这种原发的道德感等等入手，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些。芬兰培养的那些美德，和儒家强调的美德是因各自文化而有不同，但是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所以其实，你说那个担心，我觉得是不必要的，尤其是涉及到儒家的传统。你说到的那些愚昧的东西，比如二十四孝中特别极端的例子，我想新教材也不会选。而像我说的《孝经》这种经典，是非常不极端的，它是考虑到个体的人格和自主判断的，儒家的经典就是这样的，所以培养出的君子所具有的那种独立性，我们也是知道的。儒家绝对不会主张君子是一个盲从者。至于前面你的两个担忧，我觉得也都不是很根本的。

黄：好的。

张：关键就是说它不能够把这些东西压得太重，就像你说的完全作为一个知识来灌输，这就失去了学习国学经典的味道。

黄：意义。

张：国学的经典就是要.....

黄：建造人格，成人。

张：像朱子讲的“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让他很优游从容地玩味，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感到快乐，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为此上面也用了些力气来调整，比如禁止奥数班，但很多时候不管用，因为你上边有高考这个独木桥在卡着。未来大学的增多或者机会的增多，或者一些新的格局的出现，是不是会改变这个状态，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引进这种国学教材，恰恰是一个良性的发展，总的来说。

黄：好的，你是哪一年从北大退休的。

张：2012年，正好20年。

黄：到山大是什么时候。

张：就是2012年。

黄：然后什么时候，现在又到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哲学系。

张：就是去年2017年，就是在山大待了5年，珠海就是估计就是待3年，签的合同就是3年。

黄：你现在做，你比如在山大这几年，和珠海做的，主要做的是什，还是刚才的条线的。

张：发表论文是尽量围绕孝的问题，但是有时候也有一些其他的东，但是主线是这个。

黄：还是孝的问题。

张：另外像儒家，就是像我说的儒家特区的可能性的探讨，我还是很感兴趣，也写过一点，包括跟阿米什人社区的对比等等。

黄：发表过这篇文章吗？关于阿米什人的。

张：有。

黄：已经有了，有意思，好的，好，那非常感谢，我们俩聊了将近三个小时。聊得不偿很带劲。

张：都不觉得时间这样快。

黄：非常感谢您。

张：也要感谢你。

【张祥龙著作目录】

1. 《海德格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商务印书馆，2007；台湾台北：康德出版社，2005年版易名《海德格尔：二十世纪最原创的思想家》）；
2. 《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商务印书馆，2001）；
3. 《现象学思潮在中国》（张祥龙、杜小真、黄应全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 《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团结出版社，2003）；
5. 《西方哲学笔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 《当代西方哲学笔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Sprache und Wirklichkeit: Eine interkulturelle Perspektive（《语言与实在：一种文化间的视野》，与他人合著，Traugott Bautz, 2005）；
7. 《思想避难：全球化中的中国古代哲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 《中华古学与现象学》（山东友谊出版社，2008）。
9. 《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礼乐人生与哲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10. 《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北京三联书店，1996，2007修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修订新版）；
11. 《先秦儒家哲学九讲：从《春秋》到荀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2. 《现象学导论七讲：从原著阐发原意（修订新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13. 《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商务印书馆，2011）；
14. 《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
15. 《家与孝》

English Title:

The Broad Prospects of the Cooperation in the Filial Piety of Family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Xianglong ZHANG

(1949, Hong Kong—2022, Beijing), Ph.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Professor at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Shandong University and Zhongshan University (Zhuhai Campus).

Abstract: This is a dialogue between Paulos Huang (Professor at Shanghai University) and Xianglong Zhang on the cooperation in the Filial Piety of Family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It includes the following issues: How has Professor Lin HE influenced Zhang to study philosophy? Zhang's study on Phenomenology and Daoism in USA. How has Zhang changed his study focus from Phenomenology into Chinese traditions after he returned to China from USA? The cooperation potentiality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on the filial piety of family. How has Amish in Pennsylvania influenced Zhang to promote similar Confucian special zone in China? The aim of education to study so as to become a real human being in Confucianism and Finland.

Keywords: the filial piety of family, Lin HE, Phenomenology,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Confucian Special Zone, study to become a real human being

责任编辑 何丹春